

島嶼東南亞田野記事專題編語

梅慧玉

本專題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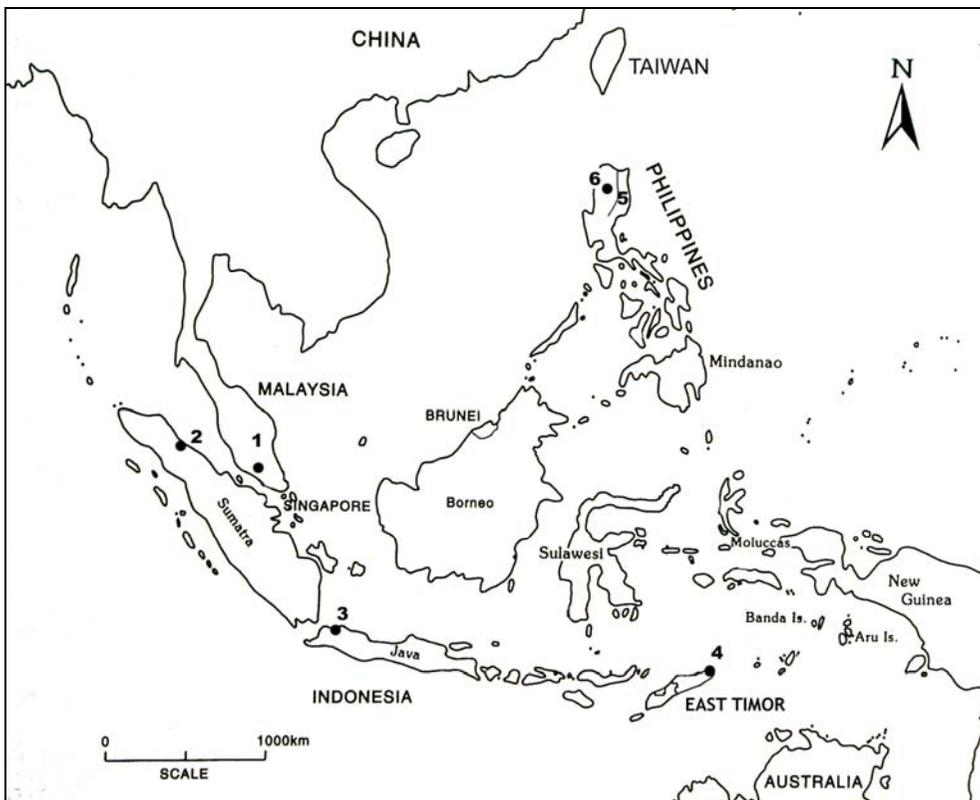
在一個機緣下，我興起了邀稿的念頭，聯合兩位已經（蔡晏霖）或仍在（梁志輝）東南亞出田野的新生代人類學者，合寫這個記事專題，分享屬於人類學家特有的私密。我們目前的田野點分別在馬來西亞與印尼兩個國家；研究的對象有南島語族的馬來原住民，也有不同層次的華裔印尼人；研究的地點則從村落（柔河區）、中型都市（棉蘭）到大都會（雅加達）；而關心的議題包括了地方知識的形成、社會記憶與不可言喻的社會創造，以及社會情感的流動與認同等。我們在研究地點待了七個月、十五個月以上，或者為了澄清在地觀點，乾脆入學當地大學的博士班，歷經數年之久。以這樣的方式，單槍匹馬地投身於異文化的人類學式研究，在台灣的現階段，似乎還是顯得奢侈與冒險，因為必須面對與克服非常多的限制、困難，甚至挫敗。反芻歷程，我們希望各自的經驗能提供一些實用性的資訊以及方法上的反思。

這個專題也邀請了三位年輕考古學者（趙金勇、洪曉純、鍾亦興）談各自的海外田野遭遇。他們的研究點分別在東帝汶與菲律賓兩個國家；學術涉及南海貿易、南島語族的起源，以及人文地景等範疇與議題；研究方法除了傳統式的發掘探勘外，也有借助人類學家參與觀察法的現生人考古。原本，這些無關工作的人事地物經驗描述，隱而不見於以「物」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考古學者文章討論中，然而，當考古的時空轉換到台灣之外的異域，這些工作中點點滴滴的遭逢、際遇卻無所遁形地影響著研究者的議題與考古田野的風格，著實值得分享。異中見同的是，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一樣，進行海外的研究工作其實不輕鬆，面臨相同的反思與自我定位，甚至生命危險。

田野工作是個看似簡單，實則複雜的人文現象探究過程。出田野不只意涵含著資料的蒐集與知識的累積而已，更反映了研究者當下的時空經驗及生活實踐，因而，參與觀察法、田野倫理、研究者的性別、角色、自我定位等這些議題成為本期專題研究六位（三男三女、三位人類學三位考古學）作者討論的交

集。此外，本期的田野記事專題研究也刻意以較活潑輕鬆的書寫形式呈現，分享作者們有趣難忘的生命經驗。當然分享之餘，我們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的同好投入我們的研究行列，或許日後以田野團隊（team work）共赴遠征、處理相關議題的夢想指日可待！

本專題文章的順序排列依島嶼東南亞的田野地國家，先後分別為馬來西亞、印尼、東帝汶與菲律賓，前三篇為人類學家之作、後三篇為考古學家所寫，下圖為我們六個人田野點的大略所在位置。



（地圖製作者：趙金勇）

1 : Johol ; 2 : Medan ; 3 : Jakarta ; 4 : Tutuala ; 5 : Cagayan ; 6 : Kalinga

Hap Lada Tak Sedap! 馬來半島柔河 (Johol) 地區 *Temuan* 族群田野調查紀實

梁志輝*

八點多時Mak¹正在廚房搗著辣椒，空氣中充滿了辛辣味，剛從浴室沖涼出來的我只好傻笑著快速的離開，Mak看到了我的動作，笑著說：「Liang! *Hap lada tak sedap lah!*」。(2004年5月田野日誌)

「*Hap lada tak sedap lah!*」(沒有辣椒不夠好吃啦!)，辣椒對我的*Temuan*族人來說是飲食中不可或缺的，不僅可以使食物更美味，也是一道佳餚。對於在原住民 (*Orang Asli*) 村落²中進行研究的我來說，田野工作的「辣椒」是什麼呢？我常常這樣的問我自己，答案當然是不會只有一個，就像辣椒也不是只有一種。無論研究的範圍是在都市、農村或者部落裡，人類學家收集資料的主要根據都來自於長期的田野工作，來自於其本人對一個地區長時間的參與觀察。除了原始資料的收集，對於田野經驗的思考，品嚐田野工作中的「辣」也是每一個田野工作者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作為一個台灣的研究者要研究國外異文化的少數族群有其先天上的困難：除了沒有正式的邦交關係外，首先是很少有研究單位願意實質的支持這樣的研究，也就是說所有的研究經費大多得自籌；其次是必須重新學習一種到兩種的新語言，可惜的是台灣的學術機構並不重視語言學習（除了英文、日文之外吧！），大部分的研究者也因此而卻步。2000年7月，當我開始我的馬來半島

* 現為馬來西亞國民大學馬來世界與文明研究所 (Institut Alam dan Tamadun Melayu (ATMA),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¹ 由於*Temuan Adat*的規定整個*Temuan*在母系架構下有一套稱為*Pangkat*的階序關係，在日常生活中是不能使用真正名字 (*Nama Sebenar*) 來稱呼人的，只能使用*Pangkat*體系中的排行名或小名 (*Nama Panggilan*)。這裡的Mak是我在家系中對母親的稱呼，因Mak排行第三，所以家系中的其他成員則稱她為Mak Lang，稱族長為Pak Lang。本文特別用斜體式的英文代表馬來語及*Temuan*方言。

² 這裡的村落是*Temuan* 語*Kampong*的翻譯。雖然Johol地區的*Temuan*人是以家系為主居住在山谷之間，但長期定居的結果，基本上*Temuan*人已經接受馬來人的村落 (*Kampung*) 概念，因此每個錯落於山谷間的居住點都以村為名，如我居住的村落叫做*Kampong Tering*。

少數族群研究時，我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同樣的沒有任何經費，而我在前往馬來西亞之前只會兩個馬來語單字—*Orang Asli*（original people），也就是我要研究的馬來半島少數族群的總稱。

馬來西亞政府大學的外籍學生均需通過一至二年的馬來語課程，因此我也在學校裡學習了一年的標準馬來語，課程內容主要是熟悉各類文法變化。然而因為馬來語其實是一個由多種地方方言組成的混合語（lingual franca），直到1959-1966年之間才趨向系統化，並在1972年8月頒布正式的拼音系統後，標準馬來語才正式確立。因此當學習完標準馬來語之後，仍然經常聽不懂或者使用著讓別人覺得很彆扭的語言，這些只能在平時透過與人交談、互動中逐漸加強使用生活馬來語的經驗。進入田野後，雖然我所研究的 *Temuan* 人使用一種同屬馬來語系的方言，但他們慣用的稱謂用語、各種字詞卻完全不同，對我來說仍是陌生的，得重新認識。就這樣，利用不斷學習語言的過程，了解馬來語背後的文化知識，成為我田野經驗中很重要的一環。由於族人經常好心地糾正我的發音用字，我的 *Temuan* 語也因此有了進步，值得高興的是，後來當我到外村從事系譜調查時，已經不再會被認為是外國人了，對那些我所接觸過的外村人來說，*Liang* 最多只是一個會說 *Temuan* 語的本地華人。然而即便如此，*Mak* 每次都還是得提醒那些來自更遠村落的訪客，放慢講話的速度，否則，他們就會看到我傻笑的表情了。

田野調查方法的始祖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認為，田野工作成功的奧秘有三：首先必須有科學目標，知曉民族志的準則；其次是要學習土著的語言，完全的生活在土著人當中；最後則是使用方法來蒐集與處理原始資料。我想每個經歷過田野工作的學者都會贊成這三點，但每位研究者也會同意「進入田野之後，仍是一切未知」這句話，如何在田野調查過程中擅用研究者的「辣椒」似乎也是田野可否成功的因素。語言應該是這些「辣椒」中很重要的一種，其他呢？或者是科學的方法，或者是分享與互惠關係，甚至一個傻笑，有各種不同辣味，至於味道如何則須親身體驗。

研究的開始

在真正與研究對象接觸，進行訪問、觀察之前，仍然有些準備工作需要進行，這些包括申請研究許可、簽證，找到適合的地點做研究以及進駐田野地點

等，都是研究過程中的重要環節。

研究許可的申請

不論是外國人或本國人的身分在馬來西亞這個國家從事調查研究工作，均需要向國家單位申請研究許可。研究許可基本是以一年為期，期限到只可以再延長半年。有了研究許可才可申請較長期的居留，同時，當進行調查時才能免於因非法研究被警察等相關單位扣留的命運。一位也從事原住民村落調查的前輩曾告訴我他的經驗，當年他進駐到田野地點的第二天早上警察就找上門了，還好他已經拿到研究許可才住到部落裡，而不是一邊作調查一邊等許可，否則將被迫終止這個研究，因此他提醒我研究許可的重要性。不過，彼此從事調查的時間已相隔十年之久，雖然我也是等到拿到研究許可才真正住進部落，但之前，為了尋找適合的田野地點，已在當地的學者、原住民官員陪同下勘查過不同的村落，或許是現在對原住民村落較開放，或許是熟人帶領的關係，我並未遇到過被相關單位詢問的情形。

申請許可的單位是首相署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的經濟計畫處 (Economic Planning Unit, 簡稱 EPU)，這是每一位在馬來西亞從事研究工作的人都會認識的單位，而且印象深刻：這個單位往往要研究者花上至少半年的時間，等待他們對研究許可的答覆。為什麼我用等待這個字眼呢！因為整個申請過程大致是這樣的：

首先必須先向 EPU 這個單位取得申請書 (幸運的是，現在可以從其網頁 www.epu.jpm.my 下載申請書與申請規則)，寫好申請書連同研究計畫、經費資助信函、在馬來西亞的接待單位推薦函、護照影本、照片、手續費等一併寄出，其中正本寄給 EPU，副本寄給移民局、學術審核單位 (依照學科分送不同單位)、教育部、所要前往的州政府、相關政府單位 (我的申請案是送原住民事務局, Jabatan Hal Ehwal Orang Asli, JHEOA) 等。

因為副本收件單位多，而且各單位可能再轉發給下級單位審查後才彙整意見，接下來就是等待每個單位走完個別的審核流程。以我的個案為例，寄給教育部的副本會送回學校，學校因尊重系所教授的意見，所以副本最後會回到我的指導教授手中，由他來審查；而寄給原住民事務總局的那份，則會再送到我要去的州政府的原住民事務局，由他們決定同不同意我去做研究。

最後每一個單位將審核意見送回 EPU，由 EPU 再召開審查會議，進一步討論，而這個審查會議可能因為許多其他的因素（諸如人員渡假不在）而延期召開。整個申請期間研究許可申請案會在政府各部門裡被轉送過來轉送過去，當完全不認識任何承辦人員時，研究者所能作的就只是等待了。

漫長等待過後，得到的審核結果可能是肯定的答案，也可能是否定的。就我所知，被拒絕的機率還不低，特別是提出政府不喜歡的議題做研究時，或是申請者過去有不良紀錄，都可能面臨被禁止的命運。雖然我所研究的馬來半島原住民議題也經常是個不容易過關的案子，但是作為馬來西亞政府大學的博士生、有一個社會與學術資源較強的指導教授、以及認識原住民官員，並且知道誰是承辦人員…種種條件時，我的研究許可在五個月的等待後終於被核准了。同時段，一位來自日本的同學花了七個月的時間才辦成，眾人只好安慰他，因為研究點在沙巴，得多花些時間等待公文旅行。

當拿到研究許可之後就可以向移民局申請一年的居留簽證。不過被馬來西亞政府接受可以居留與合法做研究並不同於可以任意進入村落，展開研究工作。對人類學者而言，由於所有的原始材料均來自於研究者的親身參與觀察與訪問，是否被研究對象接納，是否可以正式的住到村子裡，才是研究工作能不能展開的重點。

進入田野、編入家系

早上八點從庇牢（Kuala Pilah）到芙蓉（Seremban）的車上，大該是非假日的關係坐車的人並不多，因此很安靜，也讓我靜下心來想想過去十多天的經歷，雖然只是短暫的離開，但這是第一次離開村子回學校，所以也讓家系裡的人緊張了起來。幾天之前族人們自從知道我將回學校一趟，便開始問我要去幾天？做些什麼事？了解之後又進而擔心我會不會坐車，因為從村子到吉隆坡（Kuala Lumpur）需要轉換四次不同的交通工具，因此接連的幾天來，不斷有人提起這件事，還要安排我可以坐誰的車到哪裡，再安排誰接我等等。我告訴我的家人想要自己學會如何搭車，以後才知道怎麼回家，況且轉車換車的問題也是可以問人的，然而他們還是擔心。（2004年4月田野日誌）

對我的族人來說，他們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圍繞在幾個村落之間，或者鄰近的小鎮。州政府所在地芙蓉（Seremban）對他們已是有些陌生了，首都吉隆坡更是很多人從未去過的地方，實際距離雖然不是很遠，但感覺卻是陌生的，

因此他們擔心。在這十天的初步田野中，我也從一個來自台灣的學生到編入家系，成為他們的家人，有父母、兄弟姐妹、有各種親戚，因此他們關心。

根據 *Temuan* 人的慣習規範，要居住在村子裡必須是村子裡家系的成員，非家系成員除婚姻之外，必須經過一個公開的編入 (*incorporate*) 儀式³才能留在村落裡。相對地，犯嚴重過錯的人有可能被 *Batin* 與 *Orang yang Adat* (有 *Adat* 頭銜職位的人)⁴ 決定放逐。我的運氣很好，遇到柔河地區 (*Mukim Johol*) 的 *Dato Batin* (族長)，他很樂見我在這個過去沒有人來作過研究的地區從事調查，並接受我成為他的兒子，也因此我能夠被編入家系，成為家系的一員，能夠居住在村落裡，漸漸地開始認識其他村人進而至其他村落。

作為一個田野工作者的我雖時時觀察他們，但也意識到自己是被族人們觀察著：從我的穿著到我所使用的工具都會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話題，又發生了什麼糗事也成為他們最愛談的笑話，而且消息很快的可以從這一村傳到另一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的活動成為他們下午茶時段的話題焦點，當時正展開系譜調查，每每從外村調查回來之後，他們會想看我拍了什麼照片，由於使用的是數位相機，所以很容易可以跟他們分享成果。之後他們會問我今天到了哪些村哪些家，然後糾正一些記錄方面的錯誤，或者告訴我一些新訊息。這類互動也包括他們覺得我拍的照片很漂亮，因此沖印了不少照片送給族人，也開始有人找我去當業餘的攝影師…等。一直到幾個月過去了，我的存在開始漸漸地被忽略了 (或是他們習慣了我的存在)，族人又可以很自在地交談而不需照顧我聽不聽得懂，或是該不該在我面前說，也不再需要解釋事情的前因後果，這時，我開始更像個 *Temuan* 人了，不只是通過編入一個家系，我真正的在生活上被接受了。

Temuan 與馬來半島原住民 (*Orang Asli*)

過年前一個星期我剛好回學校參加研討會，*Busu Aboy* 打了電話給我說，*Along* 要開車載他媽媽、*Kak ngah*、*Em* 等到吉隆坡，

³ 在過去這個儀式需所有擁有 *Adat* 頭銜的人、家系成員到齊，經過討論，繳交一定的金額，介紹編入的成員然後有個宴會等，而我所經歷到的則只是族長將我介紹給家系其他成員的簡化版本。

⁴ 這些擁有 *Adat* 頭銜的人是依據其母系家系的資格經過討論而繼承的，包括 *Batin*、*Mentri*、*Jenang*、*Jekerah*、*Mehitam*、*Meputih*、*Kano*，每一個繼承頭銜的人也表示其在 *Johol* 的 *Temuan* 社會有一定職責。

要我到時帶她們到Shopping Mall去買些過年要用的東西，之後順便參觀吉隆坡，然後一起回村子。這一天我們逛了Shopping Mall，我也帶她們坐了生平第一次的火車（區間車系MRT）、捷運（LRT），也帶她們逛了市區，參觀了雙峰塔（KLCC）、藝術市場（*Pasar Seni*）、茨廠街等。這一天我當了一天的導遊，我這個非馬來西亞人帶領了這塊土地的原始主人來參觀他們國家的首都。（根據2004年12月田野日誌）⁵

或許你讀到上面的田野日誌會有些許的感觸，事實上我的村人是經濟條件較佳的，而大部分的馬來半島原住民的經濟狀況都在貧窮之列，過著依靠森林的生活。他們的村落位於森林之中，就像他們的人口數字被其他三大族群所掩蓋一般看不出來，他們的聲音、他們的社會位置就這樣被掩蓋著，是個沉默的族群，即使是馬來西亞人對這些少數族群也是認識不多的。

馬來西亞是一個以多元族群文化自許的國家，在整個馬來半島上除了馬來人、華人與印度人等主要三大族群之外，尚有為數不到總人口百分之一，約近十萬人的原住民（*Orang Asli*），這些原住民可分為*Negrito*、*Senoi*、*Proto-Malays*等三大類十八個族群，⁶其中*Negrito*包括*Kintaq*、*Kensiu*、*Jahai*、*Mendriq*、*Batek*、*Lanoh*等族群，主要居住在馬來半島北部，過著採獵的生活總人口約二千多人。*Senoi*約有三萬七千多人，包括*Semai*、*Temiar*、*Jah Hut*、*Semaq Beri*、*Chewong*、*Mah Meri*等族群，主要居住於中央山脈的高地，過著游耕的生活。*Proto-Malays*包括*Temuan*、*Semelai*、*Jakun*、*Orang Kanaq*、*Orang Kuala*、*Orang Seletar*等族群，居住於馬來半島南半部的淺山地區。

原始馬來人（*Proto-Malays*）是屬於南島語系，因其語言、風俗近似馬來人，且居住於淺山地區，與馬來、印度、華人等三大族群有較大的互動，於是原始馬來人的社會位置也就擺盪在其他原住民與馬來人之間。我所研究的*Temuan*是原始馬來人中較大的一個族群，總人口約有一萬五千多人，分部於雪蘭莪（*Selangor*）、森美蘭（*Negeri Sembilan*）等州的淺山地區。*Temuan*人是非常友善的族群，這是我訪問過許多*Temuan*村落的共同感覺，就像他們的族稱

⁵ 在我研究的柔河地區的十個*Temuan*村子中，我家系的村子是過西曆元旦新年，較多的村子是過馬來人的*Hari Raya*，只有一個村子的少部分族人是過華人農曆新年。

⁶ 學者之間對馬來半島原住民（*Orang Asli*）的族群分類會有些許差異，這裡使用的是一般被接受的分類方式。其中*Negrito*也稱作*Semang*，而*Proto-Malays*學者也使用*Aboriginal Malays*、*Melayu Asli*等。

一樣。⁷ 在西方早期的觀察者紀錄這個族群分別使用 *Mintra*、*Biduanda*、*Belandas* 或者 *Sakai* 來稱呼，一直到 1970 年代官方才正式使用 *Temuan* 來稱呼這個族群，我的村人還可以指出不同地區的不同 *Temuan* 人中語言、習慣的些許差異，有時也用 *Temuan Nyap* 來指稱跟他們有些不同的 *Temuan* 人。

我的田野點位於森美蘭州 (Negeri Sembilan) 的柔河地區，是由十個原住民村落所組成的 *Temuan* 社會，處於三大族群之間。柔河地區是傳統上森美蘭州四個原住民族群統治的地區，所以其族長是有 *Dato* 頭銜的 *Dato Batin*。現在十個左右的村落位於各個山谷之間，每個村落相距約為十至三十分鐘的車程，每個村落約有十五至二十個家戶，分屬於二至四個家系。家系之內與家系之間的通婚有嚴格的規定，因為婚姻關係也使得村落與村落之間的關係緊密結合。在我每日村訪的系譜調查中，我曾保留了離我的村子最近的一個村子，作為思考是否會因距離因素而能夠很快地認識這個村的村人，但事實卻不然，反而是因為親屬關係讓我對非柔河地區且距離較遠的原住民村落有很多了解，最近的村子我卻認識不多，親屬關係似乎才是密切往來的因素之一。

柔河地區的 *Temuan* 人主要經濟來源是來自於割膠，賣膠所得，在不下雨的早上，大部分的人得到膠園工作，這部分的工作主要是屬於男性的，而女性的工作除了家庭事務外，也要負責果園的整理。每日的飲食除了米必須購買之外，其他的大多來自於大自然，男性負責打獵，女性則是採野菜。常常在晚餐之前我都不知道今天將會吃什麼食物，因為食物來自於大自然，可以任何時間去取得，儲藏的概念並不強。差不多在同一段時間，可以在不同的家裡吃到同樣的東西，或者是打獵而來的山產（諸如猴子、山豬、小鹿等），或者是自製的糕點（如炸香蕉）。因為他們對大自然是分享的態度，所以必須分享各種食物給其他人。這個分享從其鄰近家屋開始，鄰近家屋通常屬於同一個家系，由母系親屬關係所組成的 *Temuan* 家系不但是這個社會的基礎，同時也是 *Temuan Adat* 實踐的開始。

生活知識與田野工作

傍晚從外村作系譜訪問回來之後，直接到了 *Mak Ngah* 家，只有女性在喝茶聊天，男性都不在，我覺得很奇怪就問 *Mak Ngah*，*Mak Ngah*

⁷ *Temuan* 這個字的原詞 *Temu* 是相遇、拜會、訪問等意思。

說 *Busu Aboy* 跟 *Pak Lang (Batin)* 他們都在上面。於是我騎車到上面 *Suman* 的家，*Ulong*、*Bang Ngah*、*Along Epi* 也在，*Ulong* 還帶著一支獵槍，晚上準備去獵猴子，現在正準備獵猴子用的吹箭 (*Damak*) 並將毒藥 (*ipuh*) 塗上去，*Batin* 正在跟 *Aboy*、*Epi* 解釋要如何才能把吹箭削的好，也順便告訴我，這毒藥是由 *Kayas* 與 *Arkat humpas* 二種樹的汁液熬成的，非常毒，射到猴子只要數到五，猴子就跌下來。
(根據 2004 年 4 月田野日誌)

我所研究的內容之一是有關於 *Temuan* 這個母系族群的「*Adat*」實踐，「*Adat*」這個詞雖然是一個阿拉伯借字，但在整個島嶼東南亞是非常普遍的一個馬來語詞彙，它是慣習、習慣法，規範著 *Temuan* 人的生活，也是一種實踐中的生活知識 (*knowledge of everyday life*)。*Temuan Adat* 的基層來自於一個母系親屬組織，透過 *Adat* 的日常實踐把整個 *Temuan* 社會組織起來，然而族人不會時時把這些 *Adat* 規條放在嘴邊，而是當事情發生時，人們才根據過往的經驗來處理、解釋，因此 *Adat* 有很強的日常生活實踐的意涵，也因此對 *Temuan Adat* 的研究不能只想從文本著手，同時也要從日常生活中去觀察。

日常生活的特別在於他沒有特出之處，總是被忽略，但卻是生活中最大的一部分。這些日常生活知識是沒有書寫文本的教科書，它的素材來自於日常生活發生時，來自於大自然，也來自於與外在世界的接觸。這些日常生活知識大者諸如婚姻禮俗，小者諸如射猴子的吹箭如何製作、如何上毒藥等都是一點一滴在日常生活中明白，他們在每日的生活中看著年長者如何做，或是親身操作學習，整體的 *Temuan Adat* 精神也就這樣植根在每一個 *Temuan* 人的心中。

在每次的重要儀禮時年老者總會提醒年輕者要注意看，或者要求跟著做。總讓我想起我跟著他們學習 *violo* 與 *kongkong*⁸ 的經驗，同樣的是用眼觀察以及一次次地操作，所謂的教就是操作給你看，在眾多的學習者中，有些人很快的學會，有些人則笨拙的一再嘗試至最終放棄，學習好的人於是繼承了這項文化傳承，放棄的人也不擔心，因為族人們總是能找到其他方面讓他們能發揮所長的地方。每個 *Temuan* 人在日常生活中學習、實踐這樣的知識，*Temuan Adat* 的規範與實踐也讓整個 *Temuan* 社會得以延續他們的文化，傳承他們的生活知識，因為他們學習的不是口傳的 *Adat* 文本，而是 *Adat* 真正的實踐精神。

⁸ *Violo* 即是小提琴，這裡的學小提琴是指學習結婚時必須要伴奏的一首音樂，而非學習樂器；*Kongkong* 則是敲打木頭的樂器，由四塊木頭組成，可以一人敲四塊，也可以由二人分別合作，敲打主音、配音。

對我來說，透過每日參與族人活動的田野工作、學習成為 *Temuan* 人的過程，是研究 *Temuan Adat* 的最好切入點。田野的通過並不只在於經驗一個異文化，而且也在於感激與分享個人與研究對象的情感。住在那裡（being there）是獲得日常生活知識的最好方法，每一個村人都是田野研究者的老師，透過向所有的村人學習，收集研究的原始素材以及探究村人如何了解、如何解釋這些文化素材，並進而思考反省自己，這種學習是生活式的而非訪談式，是一種親身參與而不只是一種調查。田野工作或許有階段性，但這個生活實踐的過程是不會結束的，因為我也是個 *Temuan* 人。

Amoi Masuk Kampung

蘇門答臘田野散記

蔡晏霖*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本專題中心訪問學員

時針指向七點，忙完白天家務也開了齋的女孩子們紛紛攏著半濕的長髮往二樓大廳的地毯聚集。那裡電視已經傳出「*Bule Masuk Kampung! Bule Masuk Kampung!...*」逗趣的主題節奏。「Kak!」，AS 來到房門前以戲謔的語氣招呼我，「*Ayo! amoi masuk kampung!*」（2004年10月田野日誌）

2003年10月起，我在印尼蘇門答臘北部的棉蘭市（Medan）進行了十五個月的人類學田野工作。在這段期間內有一齣熱門電視連續劇，*Bule Masuk Kampung*（洋鬼子下鄉），描述一位美國大學生在雅加達郊區長住，學習印尼語言文化並譜出跨國戀曲的種種趣事。齋戒月節期間，每天晚上七點和寄宿家庭裡三個年輕女傭一起看這齣電視劇，不僅是我重要的學習和社交儀式，也是我最輕鬆快樂的田野經驗之一。對於劇中人操著發音詭異的印尼語在城郊社區裡被接納也被猜忌，我莞爾之際也感同身受；而他那股拿著相機到處晃、事事關心追根究底的好奇勁，也頗讓我萌生一絲與鏡像對視的尷尬，以及對所有曾被我騷擾過的報導人的感激與歉意。

然而我更看到自己與他的差異。下鄉的***bule***是個洋人，男性、白種、美國籍。而我，則像AS 謔稱我的那一句 *Ayo amoi masuk kampung*（阿妹快來下鄉啲），是個來自台灣、有華人血統、年輕、性別為女的***amoi***。¹1980年代以來，人類學家對其研究方法與寫作過程的反身性（*reflexivity*）討論一再強調，田野工作不只是一個知識累積的過程，更是一套與研究者在田野地內外的物質、人際、資訊等網絡繁密交關的社會關係。田野工作的形貌與結果也因而與研究

* 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人類學博士候選人。

¹ 在印尼語中，源於閩客方言的 *amoi* 一辭專指年輕華人女性，而 *bule* 一辭則專指白種人（男女皆可）。

者的主體位置、生命歷程、甚至內心風景等因素關係深切。如果「洋鬼子下鄉」一劇成功的轉化了印尼殖民史敘事典型的洋印羅曼史於當代第三世界的文化觀光情境，這篇「Amoi 下鄉」則意在反芻一些個人於印尼蘇門答臘島進行長期田野工作的經驗，轉化為東南亞研究方法學上反思與分享的材料。另外，本文也希望透過對田野工作幕前幕後、準備與後續的敘述與反省，進一步相對化、複雜化「田野」這一個概念；究竟人類學家所謂的田野，該始於何時，又終於何處？而田野工作的本質，又是什麼？

準此，我將在以下的篇幅裡把 *amoi masuk kampung* 拆開來說、倒過來說，分別談田野裡的空間、時間、身分等因素。首先我談下什麼鄉 (*kampung*)，一方面介紹我的田野地點蘇門答臘島棉蘭市，素描其史地背景、發展難題與前景，以供有志到棉蘭或其他東南亞中大型城市進行田野工作者參考。另一方面我也點出其他地理空間如印尼首都雅加達、台灣、與美國等之於棉蘭的意義，強調是不是 *kampung*，哪裡是田野，皆非絕對。接下來我談如何 *masuk* (進入)，藉由介紹我的田野工作之前身 (準備) 與後事 (離開)，進一步把田野這個概念的時空範疇拉長、拉大。最後，我再談誰是 *amoi*，討論田野裡的身分差異與認同，以及相應的田野方法學上的挑戰。

下什麼鄉？

棉蘭 (Medan) 的意思是平原。它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東北部的帶狀平原中心。由於土壤適合種植菸草，這片平原帶從 19 世紀中葉起成為當時世界上發展最快速的大規模殖民種植園區，也為棉蘭吸引了來自歐、美、日各國的資本，以及來自南中國、印度與荷屬印尼各地，尤其以爪哇為最眾的移工。此一發展脈絡奠定了棉蘭成為蘇門答臘北部政治、經貿中心的基礎，也賦予其族群多元且無一佔絕對優勢的異質百萬人口組成與文化樣貌。我的田野工作主題，簡單的說，就是觀察在此為數眾多的華人移民後裔與其他族群之間的社會情感流動與認同關係。

既然是蘇北中心並有百萬人口，棉蘭其實不能算是一個 *kampung*。也正因為棉蘭不是一個 *kampung*，所以它的生活環境如大部分東南亞都市一樣惡劣：空氣污濁、交通紊亂、公共設施缺乏、失業與暴力問題嚴重、停水停電淹水都是家常便飯。一句「*Ini Medan Bung!* (老兄，這就是棉蘭!)」深切表達市井

小民的無奈。而惡質的公共空間又進一步促使各階層的群眾走入標榜販賣生活品質的大型人造商業空間。在我住在棉蘭的十五個月間，兩處大型購物中心分別以 Sogo 與 Carrefour 為號召盛大開幕。另外，以市政府為首的跨國官商集團也正如如火如荼地主導市中心重新開發案，計畫在數年間再啟用三間大型綜合購物中心，使棉蘭成為媲美新加坡的區域級購物中心。「*Ini Medan Bung!*」的哀嘆聲，在官方出資刊登於 *TEMPO* 雜誌英文版的全彩廣告特輯裡搖身一變成為棉蘭走向國際之都的驚嘆號。

棉蘭不是 *kampung*，然而提起首都雅加達（華人對其暱稱「椰城」），棉蘭人又似乎常陷於一種矛盾的 *kampung* 情結裡。他們常自豪地說：椰城的交通太糟糕了，一天只能辦一件事；不像在棉蘭一天可以跑很多地方。然而網路上流傳一時的「棉蘭人完全辨識守則（*You Might be Medan Lang If...*）」又百般譏諷那些買菜時接到簡訊於是繞了半個城市只為省錢的棉蘭鄉親們。棉蘭不是 *kampung*，但是電視裡的台灣城市（以台北為代表）似乎更具有吸引力；從 2002 年橫掃印尼老少收視群的流星花園起，一齣齣台製偶像劇不斷在電子、平面媒體攻城掠地，聯手輸出關於台灣都市地景的跨國想像。而多年以來未曾間斷的求學、商業、工作、與婚姻聯繫，更不斷衍製著台灣—棉蘭之間的跨界慾望。近年來印尼與中國的民間往來大為熱絡，這些新舊台製光環雖然遜色但也仍不失色，也因此為我田野期間的幾次返台之行帶來了一些困擾與反思：

…很多人說要跟我去台灣。還有人大方表示台北生活很貴，如果住我家就可以省錢。…朋友的媳婦的同事，素昧平生，居然要我幫她寫簽證申請的擔保信！…老天，我這次回去可是要去參加研討會的，自己的時間都不夠用了，何況招待一個根本不認識的人！我檢討，是自己做了些輕易的承諾，不好意思拒絕人，一心希望他們自動說不去，好省得尷尬。但我也想，這其實考驗著田野工作者與報導人的對等關係；畢竟誰說只有「下田野」的人才有著藉著空間位移而出入他人生活的能力？而我又怎麼能清楚區劃只有這裡是、那裡不是，只有印尼是，而台灣不該是，我的「田野」？（2004 年 3 月致台灣友人信）

關於田野，有兩種常見的空間想像：第一，田野是一個可被清楚界定、描述的地理空間，而且通常與研究者在田野外的家有著空間與心理上的距離。第二，人類學家的田野地點往往位於所謂的落後地區。棉蘭人對台灣的空間想像與旅行慾望之所以曾讓我緊張，正是因為那挑戰、穿透了我在棉蘭與台灣、在田野與家之間築好的牆。而前面關於棉蘭是不是 *kampung* 的討論則意在點出：

很多我們襲用的空間範疇 (category) 如城、鄉、都市等，其實是高度相對、並深寓文化想像的。就像「洋鬼子下鄉」其實反映了印尼以都會為中心的文化媒體工業對城市邊緣與鄉村地區的異化與懷舊想像，很多人在以西方都會區為框架的城市想像裡，不也常把印尼的都市，包括棉蘭、雅加達，看成一個 *kampung* 集合體，或甚至是一個大 *kampung*？更進一步說，在後殖民、後冷戰的全球性空間秩序裡，整個印尼、東南亞、甚至整個第三世界，是不是也常被緯度高一點的我們有意、或是無知地困鎖在一個大 *kampung* 的想像裡，覺得那裡就是偏遠落後、暴力叢生？我沒有忘記，2001 年第一次下「鄉」往印尼的行李箱裡，*amoi* 也曾經很不放心地帶了衛生紙、小刀、鋼杯、肥皂、洗衣粉、乾糧、水瓶、紗布、蚊蟲藥等種種求生用品。田野是一種空間想像，它更挑戰著田野工作者生命經驗裡種種想像的空間，想像的牆。

田野之前

田野工作是一種空間經驗，當然也是時間的。人類學研究強調長時間的文化浸淫為田野經驗與其相關詮釋所帶來的寬度與縱深，因此常對於研究者在田野中的轉變著墨較深。本節則企圖拉大田野記事的時間性視野，一方面著眼於田野前的長期準備與語言學習工作，一方面則交代離開田野及其後的心路歷程。我們會發現，田野工作不僅如前節所述常常在空間上越界，在時間上也往往難以劃出清楚的段落。

我在 2003 年正式開始的田野工作，其實早已於 2000 年啟程。在進入博士班與老師第一次的晤談裡，她就要求我開始為三年後的田野工作進行安排，並強調最重要的就是語言學習。由於校園裡沒有正式的印尼語課程，我私下找到印尼學生願意以一對一方式教我一些日常印尼語會話，再於隔年暑假前往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的 SEASSI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ummer Institute) 參加八週的密集印尼語課程。SEASSI 專業的教師群與課程設計，加上同學間的相互鼓勵與課後練習，很快就為我的印尼語打下基礎，足以應付我在 2001 年暑假尾聲隻身初訪印尼，到 *Java, Kalimantan, Sumatra* 三大島旅行三週的基本語言需要。

下一個暑假，2002 年，我直接到中爪哇的大學參加中級印尼語課程，卻進一步體會了 SEASSI 老師的可貴的專業教學水準。因為所有我在印尼能找到

的，正式或非正式印尼語課程的老師，多出身英語教學背景，而不真的知道怎麼教印尼語。他們難以明白非印尼母語學習者的學習盲點，當然也就無法提供適切的教學指導。然而環境因素可以補足教學法的缺失。與大學生們建立課外互動關係有助於語言的活學活用，也可另外請他們當報導人，對感興趣的研究子題進行嘗試性的初步研究。六週的課程結束後，我二度飛往棉蘭進行三週的前期田野調查，收集論文提綱所需的地域性資料，開始學習棉蘭華人慣用的 creole 福建語，並為下一年將正式展開的長期田野工作做好必要的行程安排。

美國的東南亞研究是冷戰時期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發展的一環，其研究資源也因而循著區域研究學門的發展模式，集中於美國東西岸與中西部數個大學的區域研究中心裡。從我近三年的田野籌備過程與語言學習經驗中，反映出一個研究者在區域研究資源相對缺乏的校園從事區域研究的限制與優勢：因為學校不提供語言與區域研究課程，所以我得利用暑假做密集的語言訓練，並在學年期間自己規劃課程研讀東南亞與印尼相關典籍，再和也是印尼專家的論文指導教授討論。另外我得勤跑 Berkeley 東南亞研究中心參加相關學術活動，與其他做印尼研究的老師、學生交流。而在 Berkeley 所無法提供的幫助，例如旅行、語言學習、以及田野經費，則透過系上與自己的管道經營、爭取。

這些歷程給我許多套裝學習之外的歷練：正因為我曾經透過多種管道學習印尼語，所以對於印尼語的多樣性與地域性有許多親身體會。而對於東南亞歷史與政經環境的自主學習，則使我對於美國的東南亞研究此一學術建制與其生產的區域知識維持著一種選擇性的介入（engagement）關係。而最重要的也許是，在博士論文計畫生產過程中，我必須不斷地為不同區域研究背景的系上老師與同儕，進行東南亞相關文化與歷史脈絡的譯介工作，並回答他們源自拉丁美洲研究、非洲人類學、中國研究、文化研究等等異質知識傳統的問詢與挑戰。由此，我得以學習從一個相對與比較的視野，對於東南亞區域研究知識進行在地性與普遍性的宣稱。這些或許可以算是在資源有限的地方從事區域研究的相對優勢。

田野之後

2004 年 12 月 26 日清晨五點半，朋友的車已經在樓下等我。從 10 月以來每星期天我和 S 一群人固定早起到棉蘭最貴的住宅區 Royal Sumatra 走早街（晨起散步）。從天黑走到天亮，S 照例不停地和巧

遇的朋友打招呼，再悄聲告訴我剛剛打照面的老同學才剛動了手術，而前面走過來的那位禿頭男子有三個老婆。不等初昇的太陽曬乾高爾夫球坪上的露水，我們一行人又得往早餐店趕路；再過四天我就要離開印尼了，所以今天的行程比較趕，好讓我再回味一次棉蘭典型的炒粿條配咖啡早餐。

早上八點，我們的早餐桌椅在夾雜著棉蘭福建話與印尼語的一片談天說地聲裡劇烈搖晃起來，直到所有人出了店面在空曠的地方議論紛紛，沉重的眩暈仍然斷續來襲。下午首度有消息傳來，是亞齊那邊發生大地震了。接下來四天，我整天盯著網路和電視、聯繫朋友，探詢災情，一面打包行李、趕赴飯局，並做完幾個重要的訪問。而其實訪問內容也大多已變成致哀與聆聽災情，送別的話語變成「你怎麼不留下來到亞齊去？」幾經掙扎，考慮印尼與台灣兩邊的行政手續都已經作了安排，變更不易，我還是如期離開。

2004 年最後的幾個小時，我深深抱別來 Polonia 機場送行的朋友，離境時一路想著朋友 A 在離開 Aceh 往參加朝聖前夕罹難的一家人，以及剛搬回 Meulaboh 老家而生死未明的室友 P。飛機還在南中國海上，我怎麼已經開始覺得冷？（2004 年 12 月寫於回台灣的飛機上）

亞齊省與蘇北省比鄰於蘇門答臘島北部，史地淵源皆極深厚。1965 年亞齊發生大規模排華運動，許多華人乘接僑船前往中國，但更多選擇避居棉蘭。許多棉蘭華人，包括我所居住的第一個寄宿家庭，不是來自亞齊就是有亞齊親友。南亞地震與海嘯又為戰禍連年的亞齊帶來鉅創，震動了無數棉蘭人的心魂，也震動了棉蘭的社會救濟網絡。回台灣當天及以後，來自棉蘭的簡訊與 email 持續傳來，訴說棉蘭人目擊亞齊災民與各地救援物資一起湧進棉蘭，或是親自參與救援工作的心緒起伏：

今天報紙報導亞齊的醫療缺得嚴重在亞齊的醫院只有幾間能正常運作現在最缺是醫護人員及設備 nias 訊息很少亞齊到目前為止有 35000 罹難 50000 流離失所明天我們將開始做兒童及家庭安置工作（2005 年 1 月 1 日簡訊）

新年快樂！但是在棉蘭人人沒心情。Metal 成了華人收容所...（2005 年 1 月 1 日簡訊）

晏霖我們現在還在亞齊今天到處看後覺得醫療還好但是路上還是有屍體暴露在路面上或河裡個人覺得現在最需要的是協助難民重建家園他的工程實在太大地積的淤泥及木頭若沒重機器困難度很高（2005 年 1 月 7 日簡訊）

Gong Xi Fat Chai, Xin Nien Chin Phu, gimana imlek di Taiwan? Pasti

rame skl, di Medan agak sepi, mungkin krn tsunami. (恭喜發財，新年進步，台灣春節如何？一定很熱鬧吧。在棉蘭挺冷清的，或許是因為海嘯的關係。)(2005年2月10日簡訊)

海嘯與地震震動了我和田野的關係，離開棉蘭前的心理掙扎仍然波濤不息。除了每天仍到棉蘭報紙網站上閱讀棉蘭新聞，我在台灣與願意幫忙的朋友與團體進行串聯，希望能為在棉蘭與亞齊努力的人們提供一點點資源。人類學家所謂的田野究竟始於何時，又終於何處？至少對我來說，這次的離開只會是更多關係的開始，不是結束。

Amoi 的身分之一：「你如果支持台獨，就不能跟我們一起！」

以台灣人的身分，並能夠以棉蘭福建語進行印尼華人研究，有其優勢，也有許多我始料未及的矛盾與複雜性。一些非華裔印尼籍學者與朋友，或甚至華裔印尼籍但不會說棉蘭福建語的朋友，都曾以或羨慕或怨懟的口吻對我說，一般華人不可能如信任我一般的信任他們。一位荷蘭學者則說，棉蘭福建話很難學，因為有人想學，也沒有人會教。作為一個強烈的棉蘭華人認同標記，棉蘭福建話在華人觀念裡的確比較像是一種與生俱來的second nature，而不太是一個可被複製的溝通工具。而當我要求棉蘭朋友教我說福建話時，他們的驚訝是雙重的；不只在於有人要學，而且在於一個來自台灣說「比較深」的福建話的人會想要學棉蘭的福建話；因為在許多人的想法裡，揉雜大量馬來詞彙的棉蘭福建話，與只會說印尼話、也印尼化了的*khiau seng*（僑生）一樣，都已經是駁雜不純的文化混血物了。這深淺之別反映的是一種想像的文化／種族位階的簡化形式：台灣、中國的現代性與中國性，優於棉蘭、印尼的混血性與印尼性。而許多非華裔學者對我所抱怨過的信任問題，其實也與這種文化／種族歧視心態相關。

我每每對棉蘭的朋友們反駁這種想像位階，攻擊其大中國種族主義，卻也常常獲利於它。簡單的說，藉由展演我的中國語言與歷史知識，我得以建立我的知識權威，並換取社會關係與訪問機會。而我基於反種族沙文主義所做的攻擊，有時也容易被解讀為反中國的台獨立場聲明。但是更多時候，我的台灣人背景是甚至在我開口以前就已經被賦予某些預設立場了。於是一些曾經留學台灣的人常常以我為知音而抱怨「那些老共」，一邊強調他親台但是絕對不支持台獨。一位當年中國領館幹部堅持要我先表態絕不支持台獨，才願意開始敘述他

的生平。最極端的經驗是當一群受訪者發現我來自台灣而不是他們原來以為的中國學生後，話鋒一轉，大聲逼問起我贊不贊成兩岸統一；因為：「你如果支持台獨，就不能跟我們一起！」（2004年11月訪問稿）

走過以1950年代為高峰的政治激情歲月，棉蘭華人社群對於當年上演於棉蘭街頭巷尾，造成不少家庭鬩牆、友情分裂的紅（親中）、藍（親台）對峙記憶猶新。而近年來，這些集體記憶又在印中貿易大幅成長，與台海局勢的緊弛起伏裡，牽引出許多舊感情與新詮釋。田野期間，我每每因為如前述的真情演出而哭笑不得：一方面我驚訝於自己的國家認同與政治選擇竟如此牽動這些半百長輩的感覺神經，一方面也感到挫折，覺得他們這份對兩岸政治的關懷是一種不能承受之重，大大妨礙我的田野工作。但是換個角度想，其實也正因為我無可迴避的台灣人身分，才能使他們的中國情結與深層焦慮無所遁形，也才使我在處理棉蘭華人的認同問題時有了重要而且獨特的田野材料。研究者主體身分與田野資料取得之間的微妙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Amoi 的身分之二：差異與沉默

如前文所述，我的田野工作的目的在於觀察棉蘭華人與其他族群互動的社會過程與認同關係，而華人在家庭空間裡與印尼司機、傭人之間的雇傭與照護關係就是我的觀察重點之一。我認為，在這塊我們可暫稱為「族裔認同的親／私密邊境（intimate edges of ethnicity）」的社會生活領域裡，處處湧生著華裔與非華裔個體間在物理、社會、及情感距離上高度接近的「跨族群親／私密情境（cross-ethnic intimacies）」的論文研究就是要紀錄這些跨族群親／私密情境裡社會情感的流動與認同，藉以探究印尼華裔與非華裔族群如何在日常生活私領域裡不斷跨越、重整、協調、再生產彼此之間相對的身分差異與尊卑秩序。當然，要觀察居家內部互動的私密情境，我必須先進入那些私密情境。一個年輕單身女學生的身分給了我方便，使許多媽媽型的朋友願意主動幫助我，邀請我這個乾女兒到她們家裡去住，甚至就安排我和她們的女兒同住一室。這是難得的田野研究：有什麼情境比這更能直接觀察她們和傭人的互動？

年輕單身女性的身分也使我與年齡近似、性別相同的女傭有著比較大的互動可能。除了一起看電視、一起逛街，我也會藉口說要學習她們煮菜、整理家務、甚至用長花布巾背小孩的方法，以進行田野觀察。我們之間的談話與笑謔

涉及家人、明星、男友、婚姻、化妝品；而對於我的一些怪議論她們不敢恭維，卻也只是睜著一雙大圓眼，默默地微笑。階級與種族的疆界可以跨越，卻難以消解。她們沉默的笑容時時提醒我關於自己的限制：在棉蘭的在地語境裡，我毫無疑問的是個 *orang cina*（華人），對於信奉回教、屬於爪哇血統的她們來說正是 *bukan orang kita*（非我族類）。而我住在華人家裡、對華裔屋主的依附關係、每天由她們幫我洗碗整理房間、似乎有花不完的美金等等，都顯示著我的階級優勢。換言之，我享有的進住華人家庭、觀察私密互動的田野優勢，也同時對我的田野社會關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定調與限制。而解決之道，似乎也只能盡量從我的日常行為與言談裡強調我的局外人性格，努力當一個不一樣、比較友善的華人：

...15 歲的 L 終於受不了要清潔、煮飯、照顧小孩的工作壓力以及主人的猜忌，決定辭職不幹了！過去三個月來她和寄宿家庭裡大大小小的互動一直是我最重要的觀察對象，她的離開會是我田野工作裡災難性的危機！兩個禮拜前當她與女主人產生衝突時我一面緊張觀察，默記一切蛛絲馬跡，一邊掙扎著該不該為她說話。我不想得罪報導人，更不想看 L 受委屈，也掙扎著人類學家該不該介入非關於己的事務。後來我還是說話了，先硬後軟，給 L 求了一個月的觀察期，卻沒想到兩星期後她自己要走了。今天下午我跟著她在家裡一路轉，收拾衣服、行李、幫她還了五萬盾給洗衣服的女工 B。最後我拿出上次幫她和（一直由她照顧的）小女孩 F 照的照片，她抽出一張來留給 F，要我等她下課回家以後交給她，說是要記得 Kak L。最後，到了大門邊我問她會去哪裡，跟她要老家的地址，說有空去找她。她說不知道，不會說，反正有一條大河的村子裡有兩顆椰子樹的地方，問人就是...話沒說完，就匆忙跳上她哥哥沉默等在門邊的板車（是那種運西瓜運椰子的板車），搖搖晃晃的離開了。我這時才發現，一向熱鬧的家裡竟沒有其他人出來和她告別。（2004 年 7 月田野筆記）

我始終不知道那天不識字的 L 是不知道、不會說、還是不願意告訴我她家的地址。面對差異，或許一個田野工作者在盡力之後所能做的，就是紀錄所有被說出的，並且仔細傾聽那些在話聲止歇、停頓處，更大的沉默。田野工作的限制在此，挑戰也在此。

結語

田野工作的範疇多變，過程漫長。不只前置工作繁多，後續效應還可能牽連甚廣。更重要的是，這麼複雜而勞力傷神的工作，其結果竟然也無法完美——

除了受限於研究者自身或非自身的變數，還得面對許多無解與沉默?! 有人說，知識的本質就是部分（**partial**）、且繫於許多主觀條件與客觀情狀（**situated**）。而我認為，人文現象本來就是複雜難解的。如果不趨近以同質的複雜，又如何能理解那些現象？人類學研究的是人，而或許田野工作就是一種以人換人的知識生產過程吧。田野工作者在人文現象的沃野裡勞動；而當緊張、焦慮、挫折、喜悅等種種情緒沉澱了以後，她發現換來的，除了知識，還有更多。

Kiri-kiri, Pak! 雅加達田野調查紀實與反思

梅慧玉*

本專題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美麗的空姐在怒吼，一隻大腳踩在我的座椅上) …登機的位置在 A1，在盡頭，與去澳洲的登機方向相反，打了電話給媽，簡短的道別，母親特別叮嚀要忌口，不可以亂吃，以免胃腸不適應。我買了幾種藥隨身，有胃腸藥、感冒藥、殺蟲水、溼的消毒紙巾等等。A1 真的在很邊境的地方，還要走下樓才會看得到，和去東京曼谷的航線放在一起。A1 黑壓壓的一片人群，不少印尼人，共同的特色是皮膚都很黑，衣服的颜色也傾向於深色的，不太好看，很少見到老外，這群人感覺很多是返家的，有些看來是台商，但穿著也都不怎樣，土土的，早先的時候，東京的旅客先登機，那些旅客的服裝明顯的就比較有時尚感，跟著這群黑壓壓的人去雅加達，想著想著，心中有些忐忑，安全與衛生頗讓我擔心，感覺還真不輕鬆。…飛機順利 landing，機上的人很急忙地想解開安全帶、拿行李，空姐很生氣地制止，態度顯得有些不尋常，我趁勢問了一個還氣嘟嘟的空姐，她說這情形常發生，每回都必須用這種提醒的方式，否則秩序會亂成一團，問題比較嚴重的是手機不關機，常強力勸說，但很多人都還是用應付的態度…，她好心提醒我不要亂跑，會很危險，尤其是 1998 年之後，女性最好結伴而行，她們多半住在希爾頓的旅館，附近有方便的 shopping malls，所以都不會隨便亂跑，而且也沒有那個習慣，才說著，可以離座的訊號燈亮起，只見我後座的印尼女人，一個大腳踏上了我的座椅，取下她的東西，又快速搶先地走在我的前頭…這是我的第一個印尼經驗。(2004 年 2 月 27 日田野日記片段)

2004 年我在雅加達花了七個多月的時間進行一項華人廟宇的普查。*Kiri-kiri, Pak!* (靠左靠左，先生!) 是我學會的第一句印尼話，這句話用於搭公車，特別是搭乘一種最多可擠下十四人的載客車 (angkot，相當於台灣的六到八人座的車子) 時通知司機先生要下車的提醒語。這句話總能喚起我穿梭在那個城市

* 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人類學博士。

公共空間中的記憶：一種進行田調時寸步難行與搭車驚慌失措的記憶。這個經驗如影隨從地伴著我走完田調的過程，雖然回想起來極不愉快，但卻是我從事人類學田調以來最具有反思與挑戰性的一段時光——在台灣作研究時所不需要擔心的問題，在這個國度裡都需要仔細想過。本文即針對此次前往雅加達進行研究的經驗加以闡述，說明如何申請研究簽證及暫時居留權，同時介紹公共空間中的雅加達，及筆者如何穿梭其間蒐集資料、解決困難、如何自處與定位的問題。希望藉此對有志前往東南亞（特別是印尼）作研究的學者，提供一些實用性的訊息與了解。

田野工作序幕：申請研究簽證與暫時居留權

前往印尼作研究，所遇到第一個實務性的問題是如何獲得該國政府的研究簽證與暫時居留權，讓蒐集資料的工作合法化，這點對預計在印尼居住三個月以上的研究者來說十分重要，¹但完成持有這種簽證及暫時居留權的過程卻是十分地繁瑣與折磨人。合法研究與居留的申請分兩個階段：一個是獲得印尼專門負責審核研究案的組織（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簡稱LIPI）的許可信函，²據此向簽證處取得簽證，進入印尼；另一個是入境之後三天內必須辦理合法居留的報到手續，否則將面臨驅逐出境的命運。

為了取得第一個階段 LIPI 所核發的研究許可信函，必須在印尼這方連絡到願意協助的贊助人（與贊助單位），共同準備一堆文件申請。這些文件包括研究者的護照影本、研究計畫、以及他（她）所屬單位的經費支援信函、公立醫院的體檢報告（附有研究者的身體狀況良好的診斷字樣）、印尼方面贊助人（與贊助單位）所出的推薦信、以及紅色背景的二個月內近照等。遞件之後，LIPI 方面會組成審核小組，包括警察局、移民局與國家內政部的人員共同開會討論遞

¹ 進入印尼從事合法研究的簽證有兩種：社會文化簽證（三個月內）與研究簽證（三個月以上）。社會文化簽證的手續與研究簽證類似但稍簡，此不特別討論。筆者也聽聞不少研究者的例子是持有一個月觀光簽證進出，因為這類的簽證手續極簡單，只要在機場進行落地簽即可。一個月的期限若到了，則就近轉往其他的國家觀光幾天再重返印尼。這種做法所負擔的風險是研究的合法性問題，也有研究者因為這樣而被永遠限制入境印尼的。

² LIPI的印尼文全稱叫 Lembaga Ilmu Pengetahuan Indonesia（Indonesian Institute of Sciences），是印尼境內非常有名的政府研究機構，有不少知識分子的菁英階級在LIPI工作。LIPI的組織下有一專門負責審核研究案件的單位，決定是否發給社會文化簽證與研究簽證的同意信函。

件是否通過，一般需要二至四個月的時間，但有不少例子是拖了半年之久（或更長）才拿到 LIPI 的研究許可信，其中也有原件退回的例子。

這個申請手續最折磨人的部份是在入境印尼之後的一連串報到過程。必須先到首都雅加達再跟 LIPI 拿數份信函，分別前往交給移民局、警察局以及內政部，作為報到之用，接著再轉往田野點，向地方性的單位作類似的報到動作。雅加達的移民總局負責核發一張臨時居留證，而警察局給予旅行許可證，內政部則準備相關的信函交付申請者，前往地方報到之用。

在雅加達的申請流程最快一星期可完成，但二至三星期的例子也大有人在。一旦完成了雅加達的報到手續，地方上的就可以進行得緩一些。雖有人在這後續部份置之不理，但若是所進行的研究涉及閱讀一些機構的文書檔案，極有可能會被機構的人員要求出示研究許可證明，所以最好還是老老實實地走完每一步驟，一勞永逸。

根據規定，研究者每一季要寫一份心得報告給 LIPI，離開前的一個月要繳總報告，還要取得印尼贊助者的信函向 LIPI 換取信函給移民總局與稅務局。移民總局因而收回居留證，而稅務局則發一張出境時用的免稅證明。研究簽證的發給一開始一定是單次進出的形式，如果中途要離開印尼，才可轉成多次進出的簽證，當然，少不了又是一堆手續要辦，此不贅敘。³

因為最初申請研究簽證時是在雅加達親自遞件，⁴以及遞件的時間剛好安排在 LIPI 開定期審查會議的前幾天，所以我只等了兩星期就收到領取 LIPI 研究許可信函的通知。再度進入雅加達之後，手續屬立即處理的部份（到 LIPI、移民局、警察局）花了約一個星期的時間完成。內政部的報到則是趁田調過程中比較空閒時陸續補辦。雖說在拿捏申請的時間方面有些小運氣，但進入雅加達後，報到手續的煩瑣及每到一個單位都必須造訪兩次以上的經驗，配合著這個城市無藥可救的交通塞車，皆為所有申請過這項簽證的人共同詬病的話題。

這些機構緩慢的辦事效率是十分讓人瞠目結舌的，其實前往 LIPI、移民局與警察局的報到手續應該是一兩天之內就可完成，但往往為了一個主管簽名或

³ 有關上述申請手續的詳細步驟與準備事項，筆者已將一份在 LIPI 取得的小冊子（2004 年一月版）存放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辦公室，意者請洽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連絡人林淑慧小姐。

⁴ 一般是從申請者所在地的印尼大使館或辦事處遞件，再輾轉送往雅加達的 LIPI 審核。

蓋章拖上一個工作天，而單位與單位之間的準備文件因為有關連性，所以也無法同時辦理。有時辦事人員會突然多要一些額外的文件、寫錯居留日期或護照號碼、搞丟送去信函等，所以一大早出門，帶齊所有的資料與備份所有（包括信件在內）的文件，變成最萬全的應對策略。

有了以上的心裡準備，接著而來所面臨的議題是跟印尼官僚打交道時的金錢政治（money politics）。因為這個報到手續的耗時與繁瑣，特別是在移民總局與警察局那關的來回奔波，造成了難辦理的印象，因此衍生出付額外費用解決或是請仲介打理的因應之道。日本人多半找仲介，從一位親身經驗的人口中得知，她付了 300-400 美金的仲介費，花了三個星期完成了所需的手續。我在移民局的時候也看到每個窗口被辦理各種簽證的仲介包圍著，他們遞件的時候在申請文件中夾帶了現鈔，而辦理的人員則一面收件，一面半打開抽屜收鈔。在辦理這個手續的過程中曾問了幾個來自各地研究者對這件事情的付費經驗，結果得到卻是瞎子摸象的答案，每個人都有不同版本的付費標準，也有人沒付半毛錢就辦成的，莫衷一是。

面對這樣混亂的資訊，我第一次到移民局時十分茫然，因為辦理的時候不斷的換窗口與填表格，陪我的印尼朋友早已被移民局裡的氣氛給嚇呆了（他還是研究公共政策的），直到最後一個遞件的窗口被告之下星期再來取件的時候，因為當天已經是第二次到移民局，我終於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緒，要朋友代為詢問，若想加速這個過程，需要多付多少費用，只見還開著抽屜收錢的辦事員尷尬地笑笑，連忙說不用，並且改口要我第三天就來取件（隔天放假）。再度去移民局時為了搞懂他們的付費規矩，改請一位當地的華人朋友陪同。在大學任教的她並沒有去過移民局，但是卻能夠十分鎮定地觀察整個情勢，了解辦理的流程及所繳的費用，討論她認為可能要給「禮數」的環節，最後再透過一種應對的方式在下午只付了些微的服務費就拿到了臨時居留證，⁵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當天警察局裡，不過因為我的堅持，這個問題被這位朋友技巧性地迴避了。那次，因為她的陪同，結束了我周旋在這些機構間辦手續的夢靨。事後漸漸明白，這種跟印尼官僚打交道時的金錢政治在當地華人圈子極為流行，被我問過的華人幾乎都異口同聲地表示這是極有效的疏通管道，尤其對商人而言，特別符合

⁵ 當時給了他 \$50,000 Rp（約台幣一百五十多元）的服務費；同一時段有其他的研究者在移民局付到 \$200,000-300,000 Rp（新台幣六百到九百元左右）的，他們認為，比起日本人所付的仲介費，這個金額算是合理可以接受的。

以小錢賺大錢、分秒必爭的經營理念。

雖然我的研究簽證申請過程比起很多人來講算是出奇地順利，但是卻讓我看到了整個印尼政府的官僚體制在運作時的散漫與混亂，以及民間如何另行一套解決之道。大體而言，大部分的西方人在面對這個情境中的付費議題態度，傾向於按照規定，若是支付的話也一定是個合理的數目，但日本人就傾向於花大筆鈔票找仲介來處理，但不清楚經由仲介給出去的費用是否也是個驚人的數目，還是仲介把大部分的佣金放進了自己的口袋。至於華人申請研究簽證進入印尼的例子尚不多，我所知道的少數幾個，有付費的例，也有沒有的，不過若是其他類型的簽證遇到當地華人或台商申請時，則以交仲介辦理為主要的方式。

事實上，金錢政治中的小費文化在雅加達的生活中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整個社會因為付小費的行為而區隔出了有錢的／沒錢的、階級高的／階級低的、以及本國人／外國人這些無形卻感受得到的界限。作為一個來自繁榮的台灣，在當地又常被非華裔的印尼人看成日本人的外國人，在雅加達的生活裡，常被設定為應給一定額度小費或施捨的目標。有些人要小費的方式很委婉，有些卻要得很緊迫釘人，彷彿將情境逼近了暴力的邊緣，更有些把外國人直接當成了肥羊，而小費或施捨只是理所當然。最常見的就是搭計程車的例子，雅加達的計程車司機常以沒零錢可找為由，變相地收取小費，有些甚至故意不用里程表，而在到達目的地後隨意開價。

我在西式購物中心曾遇到侍者在收取正常的服務費外，自動替客人扣除應找的零錢當自己額外收入，也曾跟一位華裔印尼人爭論是否該在某個女傭完成份內的工作後給予額外服務費的問題。例如，多付小費給傭人是不是變相地鼓勵做事可以沒有本份的思惟，事實上因為觀察到許多類似的例子，才提出這樣的疑問。心中若是常換算與比較兩地的消費水準，可能小費的金額九牛一毛，沒有什麼不能捨的，況且還有濟貧之效，可是這個行為與思考是不是在無形中又複製、投射、與強化了原來的社會想像，進而失去了文化間該有的尊重呢？有沒有可能用其他的、存在於文化之內的交換方式取代或超越這種過於物化的價值計量呢？

公共空間中的雅加達

雅加達有半個台灣這樣大。這個城市因為是首都的關係，有它非常現代化

的一面，而政商中心的建築規模可以說是蠻嚇人的，也有極為舒適的住宅區。去年二月開始行駛一種十分高級的冷氣公車（叫 Transjakarta），路線從南到北，經過重要的商業據點及幾個大型的購物中心，有意設計成給外來者做城市導覽之用。聽過不少外來的觀光客讚美這個城市讓人流連忘返的一面，觀光客包計程車四處跑跑，享受在幾個高級區購物與美食的樂趣，但花費與本國的水準相比，卻極為便宜。可是這個城市更真實的一面，恐怕是離開政經區呈現在眼前一棟棟數不清的平房，透露出貧與富之間巨大的鴻溝，反映在很多生活細節上。例如，這個城市飲水是用買的，水龍頭流出來的黃水，用台灣人的標準，大概只能勉強用來洗衣服，可是平房區有不少人洗衣服卻是用排水溝的水洗的，儘管這個城市大部分的排水溝都堆滿了垃圾與窒礙不通的髒水。

在雅加達過生活，除非有自己的司機，否則要倚賴公共設施在空間中移動，是非常困難與危險的。居住這個城市的人不愛走路，最常在路上逗留的人是形形色色的小攤販與乞丐，他們總是把已經很忙碌的馬路點綴得更熱鬧，只要是車子停下來在等紅綠燈，賣唱的大人小孩、行乞的大人小孩、賣香煙冷飲與零食的攤販、回教搞捐款的人、還有一些要錢的地痞流氓…總會不停地穿梭在車陣中，敲車窗門談交易，我在這個城市學會雅加達人坐私家車或計程車的第一課是：進入車內，立即將車門反鎖，他們認為這樣就降低遇到搶劫的機率。

雅加達的交通狀況是出了名的糟。塞車可以很輕易的讓一段四十分鐘的車程變成兩個半小時的常態，有許多人因為負擔不起在都市買房子，所以搬到附近的郊區居住，採用天天通車的方式往返上下班，有不少人是清晨四點鐘就要出門，為的是避開從早上六點就開始的塞車時段，有些人因為同樣的理由在下午兩點鐘就下班了，因此整個城市的大街小巷總是輪流被車陣給佔領著。擔任公共運輸的車子，讓人眼花撩亂，款式有多十餘種之多，根據長短程與冷氣非冷氣而劃分，從大型的、連絡雅加達市區與鄰近郊區的冷氣車，到區域內的中型或小型車，都有人搭乘，就連摩托車也常被用來從事載客的工。

在這個城市搭公車當然有許多歎為觀止的經驗。一般公車很少關車門，方便乘客與小販、賣唱的隨時上下。因為大家可以隨時上下，所以嚴格的說起來這些公車都沒有站牌，只要跟司機講*kiri-kiri, pak*，基本上就可以下車了。雅加達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機很喜歡按喇叭吸引等車的人的注意，他們雖一路按喇叭，但當地的乘客已經修得不在意的本領，不管車內車外有多吵，他們都可以

照睡不誤，反正暫時都不打算下車。我也常聽說有人在公車上被竊被搶被勒索，不想這些事發生，除了避開搭乘某些路段、時段的公車外，不戴首飾、手機關機，⁶穿得夠平凡都是必要的掩飾。

也有人為了降低塞車的困擾，改搭火車，火車比較不容易遇到搶劫與勒索，但小偷卻很多。火車分成經濟型與冷氣車，冷氣車因為搭乘的人都是中產階級，從事國家的公務員、老師或律師等收入不差的職業，所以也相對比較安全，不過搭乘火車的過程所遇到的景觀也反映著這個城市因人滿為患、教育不足所付出的代價。坐在冷氣火車內的車廂秩序像身處難民營。從這些教育水平比較高的印尼人身上，一樣有熟悉的大聲喧譁、搶座位、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的習慣。穿梭在這樣的公共空間中，我展開了長達半年之久的華人廟宇普查。

進入田野，一切未知

整個雅加達的行政區分為五區，華人的廟宇大部分在北區與西區，但其他的三區也有分布，所以基本上每個地方都得去看看。這次田調的時間點是印尼排華政局長久以來，第一次放寬尺度讓外界有機會針對境內華人相關議題進行較公開的調查訪談。華裔印尼人廟宇的普查工作只有在1970年代初期，由一位女性法國學者Claudine Salmon暗地裡進行過，之後雖然在1988年又出版了一本由Franke Wolfgang主編的印尼華人碑文集，但雅加達部份用的仍然是Salmon當年田調的舊資料。這些資料比較偏重廟中所遺留下來文字性的記錄，對於近三、四十年新建的廟宇則著墨不多。而且當時Salmon調查的時候並沒有太留意落童（乩童）為主的這類廟宇，這些都提供了重新探索的空間。⁷

最初廟宇普查設想以計程車代步，但很快地發現不可行。不少廟宇因為是藏在彎曲的巷弄裡，只有小區域駕駛機器三輪車（bajaj）和摩托車（ojet）的司機才知道確實的位置，依賴計程車司機是沒用的；另外，地圖的標示並不一定有幫助，這個城市有些地區的門牌號碼並沒有一定的排列規則。所以普查名單中約有一半左右的廟宇是在訪談中才問出來的，而前往這些點時是藉助搭乘七、八種不同的大眾運輸工具來完成。

⁶ 手機在印尼收發簡訊的用處大於講電話的，而搭公車時為了財不露白，又特別視講手機為一種禁忌。

⁷ 有關這次華人廟宇普查在內容方面的討論，筆者將另為文說明。

這個城市公共運輸工具雖多達十餘種，卻沒有任何一個管道提供這些交通工具的正確時刻表與路線訊息，因為有安全上的顧忌以及獨自尋找廟宇位置的困難，第二個月我還在學語言的時候就在印尼大學找了可以當助理的學生，一方面充當保鏢，帶我搭車認路，另一方面訪談時作翻譯。普查的過程，也盡量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安排用走路的方式來認路，加深印象。每一趟出門我必帶相機、錄音機、筆記與地圖；此外，手帕、溼紙巾、帽子與飲水也缺一不可，這些東西放在一只不起眼的背包中，行徑中背在前方。

最初兩個月因為要上語言課，所以只能利用週末到華人區看看，試著與人交談，評估進行普查的策略。雅加達華人的廟宇並不像在台灣的，隨時去隨時可詢問出有效的訊息，負責廟方管理階層的人員往往不在，遇到的經常是做雜務的傭人，但他們總是一問三不知，有時候遇到涉及料理日常燒香事物的雇用人員就可以得出多一點的訊息，運氣極佳的話，第一次就能見到廟的總負責人或落童。否則，拜訪這些重要人物或與信徒交談的事就只能等到每個月的初一、十五了。對於所查訪的廟宇都詢問了下列幾項基本的訊息：廟的稱呼（包括印尼文與華文的書寫式稱呼與口語暱稱）、建廟的時間、廟的主神、廟的管理方式、廟的年度祭儀、廟的地址與連絡人姓名電話。此外，對於所查訪廟宇的內部空間格局與神尊恭奉位置，都拍照記錄之。

在印尼話中有三個字代表華人廟宇：klenteng/kelenteng、vihara 和 Dua Pehkung。這幾個字其實已經反映出一些華人廟宇在印尼特有的現象。印尼政府因為只承認五種宗教（佛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以及半承認儒教為合法的宗教，所以華人廟宇多半披上了佛教的外衣，不但廟內都有刻意供奉佛教的神明，並且大部分廟宇的印尼名都有vihara（佛寺）這個字，和大乘小乘佛寺在名稱上是混在一起的。在實際田調當中發現必須和被訪問的人也提到klenteng這個詞，才能讓對方明白我指的是華人社會中比較傳統式的廟宇。沒有人確實知道klenteng這個字的字源是什麼，但是有不少人流傳著klenteng是個擬聲字，特別強調鑼鼓聲在廟中所造成的效果，我在印尼人和華人當中都聽過這樣的解釋，另一個和klenteng具同樣知名度的是Dua Pehkung（大伯公）這個詞，指的是土地公或是和土地公有類似功能的土地神，不少華人說印尼人因為搞不清楚華人供奉神明的種類，所以就把所有的神都叫成Dua Pehkung，含意中也有華人廟宇的意思，我和我的助理在問路尋找廟宇的位置時，往往用klenteng或Dua Pehkung作為我們和非華人印尼人溝通的關鍵字，

掌握了這點就掌握了廟宇普查方向的第一步。

但什麼是klenteng/vihara/或Dua Pehkung呢？雅加達華人其實對這個分類，在態度上呈現模糊曖昧與變動的特色。公與私是區辦公廟和私壇的一個重要指標，但公私的定義又因人、因群體而異，無可否認的，所有的宗教單位都試圖朝向一種公共的形象在發展，但這種涉及主觀定義、甚至面子的議題在問的時候特別要透過多種方式驗證，否則很容易就漏掉了一些該列入普查的宗教單位，被報導人牽著鼻子走。普查的名單，篩選了Salmon普查的廟宇，也參考一名當地人（余祝安）所提供的資料，此外，名單中有大量的廟宇是Salmon當時遺漏、或是近三、四十年內新發展起來的，來源多半藉訪談的過程增補而來。截至2004年的十一月為止在這份名單中共計有廟宇一百一十三間，相片記錄九千多張，意外蒐集到、由當地人所錄製各類儀式的VCD四十餘份。⁸

透過廟宇普查，在過程中也衍生出幾項新的田調議題。六月下旬在查訪中發現一廟宇儀式活動特別的多，正好作為參與觀察研究的對象，藉以較質性地了解椰城華裔印尼人之宗教活動。這間源自北蘇拉威西萬雅佬（Manado）人所建立的廟，那吒廟，每個月至少有三到四次的儀式，我參與了大部分活動的觀察，包括落童的治療儀式、神明過生日與普渡。八月中到九月中恰巧遇到華人的年度大節日——農曆七月普渡，部份廟宇在這幾年之間掀起了從中國請宗教專業人員來椰城進行超度儀式的風潮，原擬定針對五間廟宇作全程參與觀察，但因大病一場而作罷，最後只作了兩間廟的記錄。由於發現齋庵經常在椰城喪葬中負責超度亡者（作佛事），所以引起了我的研究興趣。也在廟宇普查的最後一個月，走到一移民大多來自蘇門答臘島巴眼亞必（Bagan Siapiapi）人的聚落區，驚訝地發現這個聚落區的宗教氣質與風貌和我所熟悉的台灣很類似，因此那個地區的廟宇普查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像在印尼雅加達這樣一個貧窮國家的城市裡出田野，所付出針對安危方面

⁸ 另有一種較具性別特色的齋庵，標榜在家修行的女性（稱齋姊或菜姑）為主的客家人廟宇，也是會被稱為vihara，在分類上比klenteng更偏佛教，但在接觸過的幾位大乘佛教師父或信徒心中，齋庵卻被當成一個特別的範疇，佛教地位並不高。一方面齋庵因為成天關著廟門，自理門戶，有出世的色彩，所以不被叫成klenteng，但另一方面，因為至今客家人在舉行喪葬時都還有找齋姐來舉行儀式的習慣，所以齋庵又很有入世的色彩。總之，在幾次嘗試性的走訪下來，我去年在雅加達的華人廟宇普查以klenteng為優先探查對象，包括了齋庵與有落童的宗教單位，屬於大乘小乘佛教的佛寺則為普查的第三順位，因當地人並不把Salmon所說的宗祠歸類成廟宇，所以宗祠暫不列入訪問的名單中。

的考量與各類環境的適應往往優先於著手蒐集所需的資料，這個適應期或可困擾研究者達半年之久，我也是在連續居住邁入第六個月時，才能夠在公車上開始享受打盹的樂趣。⁹由於空間中的環境構成工作上極大的干擾，權衡身心所能承受的壓力，後來田調的模式還是以每週出外不超過三個全天、大部份有助理隨行的方式進行，其餘的時間就留在住所內整理筆記與照片。當到了後期產生衍生性的議題時，我也比較能夠獨立行動，就嘗試著自行前往作田調。我用創造私人空間的方式來紓解居住在這個城市的壓力，特別注意居住的品質與安全便利性。此外，也偶爾會到專供西方人去的購物中心逛逛，在那裡沒有隨處可見的小販或乞丐，寬敞而不凌亂的空間設計，讓人暫時忘記置身在這麼擁擠的城市所帶來的壓力，大部分的狀況，用這兩種方式渡過情緒的低潮期都還算蠻有效的。

結語：參與觀察的再思考

人類學學科知識的建構賴於從田野工作中的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所獲得質性的認知與瞭解。而田野工作的成效不僅反映了研究者對研究主題的主觀感受，也涉及了過程中諸多現實因素的影響，例如，田調時間的長短、經費的多寡、研究者對異文化環境在身心方面所能承擔的壓力、調適速度、以及他（她）的性別、角色、個性…等等。因此，在這個學科觀點中的人文現象既複雜又獨特，也往往和研究者的生命經驗密不可分。

我的雅加達之行突顯出在都市中進行傳統式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困境：在這裡，人類學家面對的是上千萬流動性極高的人口，而不是數十戶人家所組成的小村落，無法透過畫系譜或「生活在一起」的方式完全掌握社會現象的全貌。為了避免建立人類學家的研究永遠只能止於蠻荒，尋找「消失了的部落」或「高貴的野蠻人」這種意象，有必要在此對參與觀察的方法與概念加以澄清說明。

參與觀察法所標榜的，是以融入被研究者生活的方式，取得第一手資料，作為研究的主軸，深信用親身經歷獲得研究上深度與廣度的價值。當然這樣的方法，也因相對而言過於主觀、資料蒐集不夠系統化或是介入反而可能導致觀

⁹ 這個問題我跟四五位同時期在雅加達／或印尼出田野的外來研究者談過，發現六個月是個共同的適應指標。而其中一位更提及三至四個月的時候，待在這個國家的恐懼感達最高峰，算算時間，我也是在第三個月邁進第四個月的時候大病一場，當時不適到差點打道回府。

察上的負面影響，而備受爭議，但是這類的批評不妨礙參與觀察法所強調的精神：參與觀察所學習的不只是一種同情心(sympathy)，而是同理心(empathy)的養成。有了這個同理心作依憑的基礎，才能達到一種在經驗上趨近(experience-near)的瞭解，及一種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e)的明白。所以，相對同情心所抱持的觀望，同理心更強調一種「進入」的哲學—以趨近經驗後，得來感同身受的認識。並在下一情境中，這個認識會再作用得到新的理解。我認為掌握了這個重點與特質，就算研究地點轉換到人煙眾多的大都會區，也一樣能夠因應新的研究情境與主題，創造出研究的條件，甚而適時加入其它的研究法輔助，像以各類型的訪談彌補不足等。同時研究者也一樣能夠憑藉過去既有的經驗，掌握參與觀察的精髓。

另有一點跟參與觀察法相關的思考，在前(第一節尾)已用金錢政治的例子加以呈現。到底人類學家在為趨近內部觀點而學作一位局內人的同時，又如何不喪失局外人觀點的超然與中立？其專業角色的定位、拿捏與田野倫理這些問題在異文化的國度裡更顯得清澈透明。或許換了另一位研究者，面對雅加達人的小費文化，會採取截然不同、入境隨俗的做法，但我想，這是一個沒有標準版本的思辯過程，重點是在通過與實踐。

雖然抱持「進入田野，一切未知」的態度，但對於華人廟宇普查時的方向與線索的判斷，有不少時候(特別是在初期的摸索階段)是憑藉著過去在台灣因長期的田野工作所累積出的一種「田野感」(sense of doing fieldwork)的帶領，¹⁰逐步勾勒出研究的規模、內容與進度。無疑地，此行，既往的田野經驗扮演了決定性的助力，特別是當很多精力必須用於克服難熬的生活適應時。另一方面，我也深切體會語言的掌握與田野的時間和研究深度之間的關連性，我以為，這一切是沒有捷徑的：一但決定將研究的田野點跨出台灣，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與毅力！

(能夠回家，真好!)…好不容易大雨停了，雅加達的機場又忙碌了起來，華航的班機終於可以起飛了…這班空服員看起來都是生手，菜菜的，乘客有一些是台灣來的旅行團，上了飛機就忙著換座位，我的

¹⁰ 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點在安平，論文中所依據與蒐集的田野資料，除了包括居住在該地三十六個月的參與觀察外，也有與報導人因長達十一年的互動所得到點點滴滴的了解。此外，過去有過一段一年多的時間，密集性地參與平埔田野調查團隊，穿梭於東、南台灣的鄉鎮之間，進行祭典活動的記錄，這些經驗都有助於我2004年在雅加達的田調進行。

隔壁區坐了個年輕的印尼女人，看來是要去台灣工作的，正在用手機 send sms，可是警告的號誌燈明明都亮了幾次了，機服人員也透過擴音器提醒關手機，她不知道嗎？站在附近的空服員也沒有注意到她的行為，心中有點著急，怕真的有安危的問題，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命斷送在這個國家，一方面問空姐她的行為是否要制止，另一方面也忍不住地對她說「tidak boleh」（不可以），她立刻會我所指的，一面說「ok, ok」，另一方面大動作地關了機，彷彿作給人檢查用的，我的心中湧起了一股厭惡感，她的行為喚起了我在公共空間中面對這個城市印尼人的經驗…，能夠回家，真好！（2004年11月30日田野日記片段）

Malai! Malai! 東帝汶考古田野雜記

趙金勇*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室外大概有攝氏 40 度的高溫吧。室內更加酷熱的無風小屋裡，喝著一杯接一杯過甜的熱咖啡，坐等無止盡的問候、拜訪、協商和諮詢告一段落。眼前來來去去的長老們、長老的胞弟（或胞兄？）、長老的姊夫們（或妹婿們？）…等等。心裡不住地懷疑起來，這一切到底和我有什麼關係呢？（2003 年 6 月 23 日）

大地長老 *Bapak Rafeal*¹ 就 *tim ini*（這個研究隊）為題，足足發表了二個小時的演說。透過傳譯，*Bapak Rafeal* 翻來覆去就那麼兩句話：「我很驕傲，能參與 *tim ini* 並一起完成這本 *Tutuala* 歷史的書。我真的很高興，如此外人也能瞭解我們的歷史，我死了以後，孩子們也還能知道我們族人的過去」。我們也都很高興能有所貢獻，但長達二小時的演說催眠實在難以抵擋。終於，我坐在椅上沉沉睡去。不過，在場人士似乎也不甚在意。（2004 年 7 月 2 日）

以上兩段文字截自個人這兩年在東帝汶 (Timor L'este) 東端 Tutuala 地區的考古田野日誌。當我回頭再看這時的田野日誌，赫然發現，它與以往多年來考古田野筆記有著極大的不同。本子中除了正常的座標位置、測量數字、地形地質和遺址遺物描述等紀錄外，還記有大量與考古「無關」的人事時地物。習慣上，我傾向於把考古田野工作與田野之中的生活切割開來，與當地的人際交流自然不會出現在考古田野筆記裡。顯然，Tutuala 的考古田野經歷，已在無形之中影響了我進行田野工作時的心態和方式。這篇雜記式的短文，以比較不

*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人類學系考古學博士候選人。

¹ *Tuan tanah* (大地長老) 傳統上是由 Tutuala 氏族之長擔任，除血統的純正外，其個人能力與魅力必須足以博得其它六個氏族族長的青睞。*Tuan tanah* 掌管整個大地，有關大地的歷史以及各項巫術儀式等。*Bapak Rafeal* 就是在 2002 年底新接任的 *tuan tanah*。*Bapak* 或 *Pak* 為印尼文「父親」之意，或為對長者或上位之尊稱。此一習俗在東帝汶也通用。

帶嚴肅意味的方式，談談個人在東帝汶從事考古田野的經驗以及這些心態的調適。

初抵東帝汶

在偶然的機緣下，我加入了由美澳學者共組的東帝汶考古學研究隊。²2003年6月16日，我獨自一人搭上印尼Merpati航空公司的飛機，自峇里島飛往東帝汶首府Dili。原本同行的教授，因為所持的機票竟不為該公司駐機場的辦事窗口接受，必須重新購買機票，因此延誤。這是我對傳說中印尼式官僚作風的第一個體驗：已付款的機票也未必保證能讓你登上班機！

這只是一連串「不保證」的開始。下了機場，進入Dili市才知道原本預定集合的旅館Purple Cow Resort數月前已宣告倒閉。原先預備用來聯絡的手機後來發現因為系統不同，根本不能使用。計程車司機多半不認識官方語言葡萄牙文，抄來的地址也不保證最終找得到。

終於，在兩日後所有人員都會齊了。備妥文件，準備申請必要之通行和研究許可。一開始，我們就很順利地會見到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Cultura, Juventude e Esporto (MECJE)³的主任秘書Pak Virgilio，言妥次日就可取件。然而，三日之後，公文方始核發下來。我必須說明，東帝汶的行政文化並不官僚，承辦人員的效率頗佳。研究許可的申請流程並不困難，只需赴MECJE下屬的國家文化科(Cultura Nacional)尋問辦理即可。延誤的關鍵出在我們呈給國家文化科的申請書上，雖詳細說明了來此從事的研究項目、計劃大綱、預期成果等，卻沒有附上「上級單位」委派來此從事研究的公文證明。沒有上級指示卻主動進行研究工作，顯然不合乎當地文化的一般常情！於是，我們當然有義務補充說明清楚，才順利取得許可。

由於東帝汶沒有國內的郵務系統，我們把此至關要緊的公文影印數十份，往後月餘時間中，逢人則必恭必敬遞上一份影本。內容大致是要各級警政單位協助我們的研究田野工作。公文當然以官方語言葡萄牙文書寫，所以無人能懂。

² 成員包括專攻全新世早期(約當距今一萬年至六千年前)東南亞島民生活適應轉變的澳洲考古學教授Sue O'Connor，研究東印尼與澳洲原住民的文化人類學家Sandra Pannell 以及研究東印尼香料群島(特別是Banda Islands)的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考古學教授Peter Lape。

³ MECJE為掌管全國之教育、文化、青年以及體育等事務。相當於我們的教育部。

不過不要緊，正式的文書格式與氣派的長官簽名，顯然就具備了公文的效力，讓我們得到各方面熱情的協助。習慣上，來此的研究者應該從上而下（此順序很重要），前往各層各級單位報備。由於時間延誤，我們決定兵分兩路，一輛車去 Lautem 省府 Los Palos，向省警察局和省文化部報備，另一台車則趕赴縣府，拜會縣長、副縣長、縣警察局長和副局長。創下一日內趕赴二百公里並知會五位以上的單位首長的紀錄。

2003 年夏，初入 Tutuala

Tutuala 位於東帝汶最東邊 Lautem 省的石灰岩山區，居民操 *Fatuluku* 語，語言學上屬於比較古老的 Trans-New Guinea 語族。⁴ 村民的生活幾乎完全仰賴園藝式的農業，主要是玉米、lontar 樹⁵ 和芋類作物。取水需步行半小時下到山腰的小泉頭，炊飯所需薪柴來自山林，電力則靠警察局的發電機，每晚供應二至四小時，時通時缺，並沒有個準。傳統的社會規範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氏族長老仍是村中主要的決策者。然而，傳統與現代政治勢力之間的爭鬥無疑正逐漸發酵，而我們的考古學研究竟也偶然地陷入這一場爭鬥之中。

一般來說，考古學田野方法始於初步勘查（reconnaissance survey），地表調查（surface survey），⁶ 然後才能決定後續實際的發掘策略。不論在哪一個階段，研究策略多是依據既定的研究計畫進行，或視實際的考古遺址狀況而有所修正。2003 年夏，初次來到 Tutuala 的我，雖然還沒有明確的研究計畫，但馬上躍躍欲試想展開調查工作的體力活兒。我計畫調查岩壁、洞穴遺址以及舊社遺址等一系列緊湊的行程，以便從初步勘查的資料中，評估從考古學手段探討東帝汶史前貿易問題的潛力。顯然，積極的工作態度不保證在此地行得通。

每天的田野工作總是在一杯又一杯過甜的熱咖啡中展開，又在相同的過程中結束或拖延。「*Saute-Viva!*」（乾杯—祝健康！）是我最先學會的當地日常詞彙。前往山林中做調查，事前必須一連串報備（村長、里長、警察局、分駐所），

⁴ Trans-New Guinea 語族是與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相對的一群語言，分布在新幾內亞與部分東印尼群島。東帝汶的第二國語（也是語言人口比例最高的）*Tetun* 語則屬於南島語族。

⁵ 椰子樹的一種，可用來釀酒、製糖，葉常用於籃編，高長的樹身可當建屋的木板之用。

⁶ 這兩個步驟一般都是以徒步及目視檢查遺址的地表狀況為手段，主要差異在於後者通常經過某種方式的抽樣設計，包括調查多少比例的地區，或以何種標準採集遺物標本等。

並拜會任何一位與調查地點有關的長者，釐定清楚明日的行程計畫，以便在隔日因各種因素而取消，然後再臨時決定當日的行程。滿心期待的調查工作，大半在這些過程中延宕下去。

正當我們的沮喪與不耐逐漸加溫之際，與村民的情誼卻神奇地大幅躍進。村中孩童時尚的新遊戲是在我們行經時高呼「*Sandra! Sandra!*」或「*Peter! Peter!*」，然後一躍而起來個「give-me-five」。拜訪Cao（發音為tʃau）氏族時，長老滿心歡喜的招呼同族孩童前來觀賞「真正」的中國人，原因是Cao氏族在傳說中是中國人的後代，何況這個訪客還有個「真正」的中國名字——趙（Chao）。一時之間，我們這群外來的考古學家成為村民的新玩具。

凡事遵守當地的文化習慣以慢速檔行進，並不合乎多數考古田野的風格，而無止盡的拜會與閒聊，確實會大幅消耗研究計畫執行的效率。然而，信任與尊重卻泰半是以這樣的步伐點滴建立出來。對於一個遠赴東南亞工作的考古研究者，如何調整適應就成為田野中的一道難題。

2004 年夏，重回 Tutuala

2003年離開Tutuala時，長老交代了一件功課：寫一本 *Sejarah Tutuala*（Tutuala的歷史）。我們把記錄的口傳歷史與碳十四年代、⁷陶器熱釋光定年年代⁸以及全球定位系統（GPS）所測繪的舊社位置等科學證據並呈，彙整成一本紀錄Tutuala歷史小冊子，作為回饋村民協助，並悼念已故前大地長老Bapak Paul的禮物。

2004年夏，我們一行又再回到了Tutuala。大地長老Bapak Rafeal十分滿意我們的成果，即席發表長達二小時的演說作為獎勵。該buku（書）隨即成為流行，常有村民前來索取buku。一時洛陽紙貴（因為我們只列印了五本），研究者的虛榮心大受滿足。

一晚，一位自稱出身Tutuala氏族的外地年輕人前來探訪，並說他代表

⁷ Radiocarbon dating, 利用放射性碳元素（碳十四，¹⁴C）的衰變半衰期，以測定年代的方法。

⁸ Thermoluminescence dating, 或稱為熱螢光法定年。利用粘土中含有微量的鈾、釷和鉀等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進行測年。熱釋光定年法可判斷古物距離最近的一次受高熱的時間，譬如陶器燒製過程中必需的高溫，所以常用來判斷陶器燒製的年代。

Mehara⁹促進青少年現代化的教育團體，特地來向我們索書。當得知已無存貨之後，大表不滿，強烈抗議：「東帝汶已是一個民主國家，Tutuala的歷史自然也屬於全體族人，不應再由大地長老一人把持，我們也該交出那本重要的*buku*」。隨即糾眾指控我們干預當地的現代化奮鬥，令我們瞠目結舌，無言以對，同時惶懼不能自己。最終，紛爭再度按照傳統手段化解，一切不了了之。

其實，*buku*的內容也只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去記錄Tutuala的過去（past），全無任何對資料的解釋。所沒有省思到的是，「記錄」這個過程的本身，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創造歷史。這個例子令我深刻體認到，考古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錯綜複雜。學術性的研究活動在田野地可能掀起相當的漣漪，其衍生的波濤往往超出預期。考古學家固然可以藉由協助當地人士建立自己的地方史，培養歷史尊嚴，進而從單純「取」的角色，發展到與當地社會互惠的關係。¹⁰然而，正如這裡的例子，歷史每每是政治的一部份。身為外人的考古學者，處境並不容易，拿捏的分際則往往超出考古研究的直接對象—考古資料。從這個角度來說，深入瞭解田野地的種種人事時地物，看似與考古研究無關，卻不能說不是考古田野的工作範疇。

⁹ Tutuala以西約 20 公里的村落。Tutuala的國中學生必須每日步行來Mehara唸書。

¹⁰ 對此一議題更加深入的討論，請參閱陳玉美（1990），〈研究者與其研究對象的關係：以考古學為例〉。《田野考古》，1（1）：9-23。

到呂宋島卡加煙河流域考古

洪曉純*

這小巧的依傍著卡加煙河（Cagayan）的村子是如此寧靜，宛若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整個村子被蔭蔽在粗大的果樹和繁密的椰林中，一間間的房舍以棕櫚葉和竹枝搭建，即是所謂的干欄式建築。屋子的隔局雖小，但家家戶戶的窗台都上都植滿了鮮花，又如黑澤明夢境裡的水車村。地表上一片雪白的貝殼摻雜著破破碎碎的千年陶片，俯拾皆是……。

當我還沉醉在異地考古的興奮之情，當地的菲律賓報導人忽然神色緊張的走過來說：「這個村子安靜的太不尋常，照理說，看不到一個人影也應該有狗吠，但我們什麼聽不到，而且家家戶戶都開著門窗，……這很可能是一個反政府遊擊隊（New People's Army, NPA）的基地，他們可能已經埋伏在四週準備槍殺我們了。快走吧。快走。」忽然間，考古隊裡的所有男人開始快步行走，走過水稻田旁邊的田埂，穿過來時的獨木橋，沒有人說話，我一個女生腳步太小，幾乎就要跟不上別人了，心裡頭有些慌張，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這是 1996 年的 4 月，我第一次到菲律賓去做考古，當年的我是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學生，主持這項研究計畫的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臧振華教授。這是「東南亞區域計畫」，也就是「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前身下的一個項目，當時的計畫名稱是「台灣與東南亞古代文化關係的考古學考察和研究」。從 1996 年到 2002 年，我全程參與了這個計畫的進行。2004 年由於撰寫博士論文《台灣與菲律賓新石器時代的互動關係》的需要，我再度回到那個當年被菲律賓人誤以為是反抗軍基地的村莊——娜薩布蘭（Nagsabaran）進行考古發掘。在這樣一個沒有網路，沒有電話，椰子樹取代電線桿的異國村落，除了考古工作者原來單純處理的靜態的「物」之外，我的田野生活更多的卻是去經歷與面對許多出乎意料的「人」的問題。

* 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考古學與自然史系（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Natural History,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考古學博士候選人。

研究緣起

1996年第一次到菲的田野，是起於對南島考古學的浪漫憧憬。當時想像中的菲國是充滿花香鳥語、碧海藍天的美麗群島，甚而或許在那兒做考古還能心曠神怡的幻覺也是有的。

當時到菲的工作目的之一在於探討古代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的起源和擴散問題；依據當代語言學和人類學的研究，現在居住在台灣，東南亞（包括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以及太平洋上（包括玻里尼西亞、麥克羅尼西亞及美拉尼西亞）的近三億說南島語的民族，由於在語言和文化上的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許多研究者相信他們散佈的年代並不是很久遠，甚至許多研究都認為台灣就是這些分佈在太平洋和東南亞的南島語民族的原鄉。

由於近年來許多新的論點都是以挑戰這個學說而來，基於對這個理論的檢視的必要性，與台灣距離最近的呂宋島北海岸成為一個研究的基點，呂宋島北海岸卡加煙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是不是來自台灣的史前移民？這兩個區域之間的文化關係為何？兩地在史前貿易、交換、傳播各個方面有過那些的互動或影響？由於考古學上基本材料的不足，這成了爭論多年但卻沒有答案的問題。

在1996年與菲律賓國家博物館正式簽訂合作合約後，至今2005年這個計畫還持續著，我的角色由當時在一旁拿著地圖圖筒的懵懂小女生變成了要帶著二十個男人一起挖掘的決策者。異地的工作並沒有隨著自己的角色改變或時間的浸潤而更悠遊自在，相反的是每一次的田野要面對的是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問題以及更多的猶豫。

這個計畫看似目標明確，但由於基礎工作闕如，1996到1997年所進行的工作只能是在北呂宋的北海岸、卡加煙河流域、阿布魯（Abulug）河流域全面性徒步式的調查，以便對當地的考古遺址做初步的普查分類。到了1998年及2000、2001年的這三個年度才得以根據研究的取向做小規模的擇點試掘。一轉眼間幾個年頭過去了，我在2004又回到卡加煙河流域的娜薩布蘭挖掘。¹

¹ 所有外國人與菲律賓合作的考古計畫需要一連串的申請程序，在馬尼拉的國家博物館簽訂合作契約後才能申請發掘許可書，之後必須再到當地進行不同層級的拜會，包括卡加煙省的省長、當地的市長、村長、村落幹部到地主，這成了每季的例行工作。在這樣看似無聊的拜訪工作下卻偶而會有意外的發現，另一方面菲籍的研究者也會機會教育這些官人或大眾關於文化資產的保育概念。

我來自台灣

在 1996 年的那天下午匆忙逃離娜薩布蘭後，我們到河對岸一面喘氣一面問聖羅蘭索（San Lorzenso）村的村民，到底娜薩布蘭住了什麼樣的人？村民一頭霧水的回答說就是和他們一樣種田的伊洛卡洛（Ilokano）人啊，應該不是什麼反抗軍的基地吧。看來是同行菲人的誤判了，不僅只是菲國考古學者，就連卡加煙當地的人也會因過度緊張而誤判情勢。同行的當地學者曾在明答那峨島遇到回教反抗軍阿布塞亞（Abusaya），其間發生幾近被綁架而勒索的事件，因此他們到北呂宋來做考古調查便相當謹慎，尤其是和我們這些外國人同行更添加了風險，這也難怪當我們背包裡只帶著地圖、指北針、手鏟、標本袋和餅乾、巧克力走路時，菲律賓學者的口袋裡還會多藏一把手槍。

從馬尼拉到卡加煙的路上，雖然距離只有五百公里，但由於交通及路況的問題，往往要耗掉兩天的時間才能到達，路上坑坑洞洞，一年前開始修的馬路現在還在修同一段或是修到一半不知何故的停工。

路上風沙滾滾塵土飛揚，坐在吉普車上往往不知要開窗好還是不開窗好，開窗的話黃沙襲面真是難受。車子又老又舊又沒有空調。像這樣的情況下，在攝氏 40 多度的慢火悶燉下，從清晨到深夜，有時要煎熬 20 多個鐘頭才能到目的地。坐在悶熱令人發昏的車子裡，菲籍的研究者偶而搖下車窗讓車廂透氣，伴著漫天黃沙，他神色自若的對著搗面的我們說：「we don't have the air conditioning（冷氣）啊，but we have air continue。」這是他們一貫的自我解嘲方式，許多身體上不適的無奈就在這種菲式幽默中渡過。

2000 年再度回到娜薩布蘭這個貝塚遺址時，看到的是一個沒有現代化設備的農村，要喝水就得踩過泥濘的田埂到井邊打水，沒有水龍頭更談不上瓦斯爐，家家戶戶多半靠著撿柴炊事，電力供應則是最近幾年才開始的事，許多人的交通工具還停留在依賴水牛的階段。

記得有一回，屋主買了一部中國上海製的腳踏車，村民一有閒暇便圍著那輛腳踏車討論。有一天我閒來無事順口說了：「哎，我唸大學時被偷了一部像這樣的腳踏車。」只見村民恩芳達聽完後張大眼睛對身邊的人鬼鬼祟祟的說了一句伊洛卡洛語。我好奇的問他們恩芳達到底說了什麼啊，透過翻譯得到的答案是恩芳達相當震驚：「啊！沒想到台灣也有小偷啊？」

原來，空間的隔閡營造了人們對於異國生活的憧憬，就如同我來菲之前的許多想像。菲律賓人所想像的台灣是一個什麼樣的境地？由於菲國經濟的衰弱，來自台灣往往莫名的被貼上一個來自「富國」的標籤，這樣的標籤對於外來工作者在鄉下農村所帶來的是極度的不便，這種不便則來自於村民心裡的過度期望。

每季之始往往需要僱請當地的民工協助挖掘，在尚未工業化的菲律賓鄉下，取得這些稀少的工作機會往往成了村子裡的年度大事。在娜薩布蘭這樣民風純樸的農村，地主與村民可以自行協調提供考古隊所需要的人力，但是日本考古隊與菲律賓國家博物館在河的對岸聖羅蘭索村的發掘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村民爭奪工作的情形，可由在發掘現場一面有人繼續挖土、一邊有人在坑邊械鬥感受到其激烈程度。身為一個外來的研究者由於要動人地盤，為了滿足大眾於是開放了工作機會，沒想到聖羅蘭索村的村民予取予求，不斷的要求增工，於是演變成一個考古隊在小村的試掘僱用了七、八十人的龐大團體，其中大量的「冗員」還包括了高齡八十九歲步行不穩的老先生，考古學家除了專心發掘外還要隨時注意這位老人家會不會在坑邊走路時摔跤。

在農民苦苦哀求的眼神下，國外來的考古學者不得已而伸出援手借貸也是常有的事。我所認識其中一戶住在北呂宋島山區的人家，細數他們曾經伸手借錢的對象包括了 1970 年代的 Richard Jr. Shulter, Barbara Thiel, Wilfredo P. Ronquillo、1980 年代的小川英文、田中和彥等以及 1990 年代毫不知情的我，幾乎涵括了所有在北呂宋島工作過的考古工作者。這些借款最後都是付諸東流有去而無回了，因此依據這戶的債主名冊似乎可以來寫一篇北呂宋的考古學史。

然而，我並不喜歡被列入如此這般的「考古學史」的。幫助一位農民之後，來的是更多希望獲得幫助的農民，就像心生憐憫以為一天 200 元菲幣（合台幣大約 120 元）的工資不高，對研究經費的影響不會太大，於是給了一位渴望工作的村民，但是隔天立即出現更多想要工作的人。這種外來／本地，富有／貧窮之間的誤解，我歷經長時間努力從錯愕、不適應、試圖調和到被瞭解。這種期望被平等看待的代價必須透過諸如：寧願和所有人坐著二十多小時的破舊吉普車到達田野地（捨棄從馬尼拉搭機五十分鐘直飛北呂宋的機會）、花菲幣十元買雙和大家一樣的非菲律賓夾腳拖鞋穿（丟棄時髦好看的涼鞋）、無論人力夠不夠也要下坑努力挖土的種種方式去換取。而這樣的換取方式也未必一定能夠全盤

見效。

女性考古工作者

試想在一處男人外出耕作狩獵、女人天天蹲在井邊洗衣煮飯帶小孩的純樸鄉下，村民面對一個來自異國、開口就說想要挖自家後院的女人，那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立刻理解的事。對於一個偏僻的農村而言，「考古學」研究是什麼？至少需要一季的時間讓村民全面參與發掘才能讓他們稍稍安心（讓他們瞭解原來考古研究者找尋的是這些破舊的陶片和石片而不是金銀財寶，不過也有國外考古學者在北呂宋工作超過二十年了，但仍被誤以為來找尋黃金的盜掘者），而「我是誰」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被村民以及被自己所認識。

當白天的時候，村裡的菲律賓婦女正在洗衣理家時，我和大伙人一起拿鏟、端土，到了下工時間，村民往往會熱情地邀約一起喝酒（別忘了這時一般的菲律賓婦女正在廚忙呢）。每回考古隊借住的小房子一到晚上就不知何故的成了村裡最受歡迎的「Pub」，住遠的村民還會摸黑跨過田埂，從兩、三公里以外的地方步行前來這兒喝酒聊天（人太多的時候他們還會自備板凳），直到每個人都醉了為止。我並沒有酒量，也不願因為接受人類學的訓練而強迫自己「參與觀察」，因此當眾人皆醉時我就開始收拾那些散滿一地的酒瓶子。

無可奈何的身為考古隊裡唯一的女性，生活上小至像是晾衣服這類的瑣事也會不方便，在眾目睽睽下一舉一動都被所有的人看在眼裡和討論。2004年的這個田野季，村民不再只是記住我所說的玩笑話，還在背地裡討論我今年為何比去年瘦，猜測最近少有笑容的原因。做為一個來自異地的女性考古工作者，不可避免地要被投射多重的身分意象，其中包括台灣人／菲律賓人以及女人／男人這樣的對應關係。這種身份意象有可能是在不著痕跡下互相錯置、衝突甚至造成困擾。

在午夜時分，原本只應有皎月蛙鳴的娜薩布蘭，卻有菲籍的考古隊員與村民在酒後一時興起高聲歡唱卡拉 OK，不論他們的歌聲優美與否都會驚醒了週遭沉睡中的人家，這時究竟要怎麼辦？於是，這樣的田野經驗成了不僅要去處理「過去的物」的考古學基本任務，而更多的時間則必須花在思考如何面對「現在的人」的這樣的複雜網絡。

於是那天晚上的日記是這麼寫的：

已經午夜十二點半了，男人們還在窗外喝酒、高聲唱著卡拉 ok，我在蚊帳裡輾轉難眠，一邊抓著被跳蚤咬的紅腫不堪的腳，一邊要用長繭的手掩住耳朵，天啊，求求你們快點唱完吧，我這次挖完了就再也不要來了，真的不要再來了。(田野日記 2004 年 12 月 1 日)

要再來嗎？

2004 年剛結束的這個田野季，我們獲得了預期中的理想材料，這些材料映證了卡加煙河流域當地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可能是來自台灣的新石器時代中期階段，年代大約在距今 3,500 年到 4,000 年之間。這些新發現為南島起源的議題增添了很有用的訊息。

一名外來的考古工作者要面對的不僅只是政府官員，比較切身實際的對象是要朝夕相處的共同合作對象以及住在遺址當地的村民們。原來深以為像南島起源這樣的研究對於身為南島語民族一員的菲律賓人應具備了高度吸引力，不過這麼多年來當地菲籍的研究者對這個議題的討論卻沒有想像中的熱切（雖然他們對外來者的接待熱情年年不減），加入激烈討論的往往是外來的研究者。那麼，究竟現生南島語族的研究者如何看待這項研究的意義落點？一個外來者所攜帶來的研究旨趣如何與當地的研究者進行磨合，在取得材料後如何共同進行解釋，這個看似不是大問題的問題可能需要謹慎的執行和發言。

在娜薩布蘭，與村民共同去挖掘這腳下的貝塚遺址時，也逐漸的挖掘出了屬於他們自己數千年的過去，他們瞭解到這裡不只是一處農村，而且是一處歷史的現場，於是村民們自動自發的擔當起保護遺址的責任，並將這樣的考古學知識傳達給鄰近的村子。在挖掘工作的進行中，有許多工具都是農民自動從家裡帶來的，他們已經開始傳授我善用當地工具以及節省經費的工作辦法了。

有一天憶起了 1996 年 4 月落荒而逃的往事，不禁告訴了村民那時候的景象和心情，村民們聽了笑成一團，說 4 月份是農忙的季節，所以大家都下田收割去了，才會不見一個人影。村民說當年娜薩布蘭這個小村子的治安良好，所以大家都不鎖門。

在 2004 年這一季田野，我終於看到了村民買的第一部摩托車，村子裡的物質生活又有了一些變化。我在購物時，萬一物價過高，村裡的婦女們會聯合制止我掏錢去買，遇上即使是菲幣 5 元（折合台幣 3 塊錢）的差價，她們也會充

滿義氣的過來向小販討價還價，彷彿是自己的家務事。我逐漸被自然的溶入他們的生活脈絡了。然而，我對自身的角色定位還不是那麼明確清晰，這個自我意象似乎每年隨著自己的年齡、角色以及在田野中所遇到的人與事在變化之中。這種角色定位的更動也一直存在於我與當地的合作研究者以及村民之間的三方關係上。不過，如果你要問我還會再來嗎？即便身上被跳蚤咬過、破皮結痂的這一大片傷口還沒痊癒，我大概會說：「真想明年的這個時候還能來挖那塊沒挖完的部份啊。但只能默默祈禱不要再有夜半刺耳煩人的卡拉 OK 了。」對這件事情的適應能力我實在很不 OK。

Kalinga 民族考古田野二三事

鍾亦興*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員

很微弱的煤油燈下，我幾乎看不到。現在大概7:00多，宵禁，消息有一隊Lubuagan 人已通過 Dalupa 朝這裡來了。現在 Amdalao 和 Malucsad 往 Ableg 通路【有人】防守。8個人【躲】在一樓，水泥牆安全些。很怕…沒那麼怕過。牆上的矛頭拔下來準備了。槍支全部出【動】在外面守著（田野日誌2004年12月26日）

上文摘錄自田野日誌的段落，筆記本上字跡歪七扭八，回想當時的心情，好像有幾分寫遺書的無奈，怎麼樣我都沒想到民族考古學¹的田野會遇上部落戰爭。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2月27日，日誌開頭寫著「雖說重見天日不意外，但活著的感覺真好。」田野期間一些震撼的經驗，對於當地人來說也許只是家常便飯，卻是異文化研究者入侵衝撞後必須自行承受的結果。出發來到田野地，目的不就是蒐集資料做論文嗎？我不知道有多少考古學研究者因為這種原因半途中斷田野回家，不過我自己的確曾經連續幾天背著一個小背包（裡面只有田野記錄和證件），不知情的Kalinga人看我似乎很認真在做調查做記錄，其實我已經準備好隨時逃走。

從1997年到美國開始，我所有的田野都在台灣以外進行，地點包括美國中部、土耳其南部、中國雲南，和菲律賓幾個島嶼。每個田野所遇到的人事物雖然不盡相同，但這些經驗的累積往往有助於下一次田野。幾位研究領域相近的同學們見了面，田野期間的點點滴滴總是聊不完的話題，從這些談話內容不難看出田野經驗對研究者的理論方向與方法策略的調整有很大影響。然而，一般在考古學論文的寫作裡，少有就這類主題的專章論述，偶爾提及，多以三言兩語帶過，這單純是考古學的論文寫作習慣，並無所謂對或不對。在這篇短文裡，我將敘述一些我在菲律賓呂宋島北部山區 Kalinga 部落田野期間的故事，這些

* 亞利桑那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人類學系考古學博士候選人。

¹ 本文對考古學的定義採用美國人類學界的習慣用法，屬於人類學下的一個分支。

事件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我的研究計畫，有些跟考古學沒有直接關係，可能不會是我的論文委員們期望在考古學論文寫作裡看到的。

Kalinga 民族考古計畫

我的博士論文田野地點在菲律賓呂宋島北部 Kalinga 省山區的 Pasil Municipality，²從 2003 年開始前後去了三次，目前還在進行當中。我主要是運用民族考古學方法來觀察當地人群與地景 (landscape) 相關的行為模式，這個研究對應到史前考古學上將有助於解釋土地利用和聚落形態等問題。我的田野是整個 Kalinga 民族考古計畫 (Kalinga Ethnoarchaeological Project，以下簡稱 KEP) 的一部份。KEP 由我的指導教授 William A. Longacre 主導，開始於 1973 年，最早以傳統製陶為主題，而後加入其它如編織和金屬器等相關研究，近年更擴展到對空間的討論。³

總的來說，考古學是一門以「物」為研究對象來探討人類行為的學科。傳統上考古學蒐集資料的方法和技術以調查和發掘為主，考古田野常以團隊工作進行，研究者如果不是負責處理行政工作，整個田野期間可以跟活著的人群沒有交集。民族考古雖然也是以物質文化為研究對象，但資料蒐集的方法很不一樣，比較類似文化人類學裡的參與觀察。在 KEP 的操作裡，「民族考古學」的定義有兩個基本要素：(1) 由考古學家就現生社群的人類行為模式進行觀察，(2) 其目的是為了解釋考古材料所反映的人類行為。因此，我在田野期間必須每天和當地人群密切往來。

田野之前

原先我在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的碩士論文題目屬於地中海考古學的領域，1998 年在土耳其做田野，後來因為相關背景（歐陸各種語言與歷史）太過薄弱，博士階段的規劃我放棄了地中海考古。2000 年秋天我申請進入 University of Arizona，將目標轉到東南亞考古。當時我的指導教授 Bill

² 菲律賓的地方行政區劃分從上往下為 Province-Municipality-Barangay。Pasil Municipality 由 14 個 Barangay 組成，總人口約一萬上下。

³ 關於 KEP 的緣起及成果請參閱 Longacre, W. A., Skibo, J. M.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Kalinga Ethnoarchaeology. Pp. 1-11 in *Kalinga Ethnoarchaeology: Expanding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eds., W. A. Longacre and J. M. Skibo.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e Press.

Longacre 本人已經不再到 Kalinga 實地做田野，只有一個博士候選人 Margaret Beck 在當地以陶片堆積模式模擬遺址形成過程，工作已近尾聲。眼看著這個有 30 年歷史的民族考古計畫即將終止，我向 Longacre 表達延續 KEP 的意願。在他強力支援下，我開始準備田野工作。

按照北美考古學界（尤其是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的習慣，研究計畫的設計必須是問題取向，一般而言，贊助經費或獎學金的單位不接受「先讓我去當地看看再考慮要做什麼題目吧」這樣的提案。為此，我從蒐集文獻開始，針對古代南海貿易的區域互動擬了一個研究計畫。就已有的考古材料與歷史文獻記錄來看，一些島嶼東南亞的內陸山區特有的物產（如木材、蜜蠟、香料…等）在古代南海貿易裡相當重要，欲了解史前區域政治經濟的互動，內陸山區是一個關鍵。目前島嶼東南亞山區的考古研究發展不甚健全，原因是考古家缺乏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來解釋該地區社經組織（socioeconomic organization），研究方法也不完善。於是，我選擇了人文地景（human-modified landscapes）做為研究對象，以民族考古學的地景研究來建構島嶼東南亞內陸山區社經組織的背景知識（reference knowledge）。這個計畫還有一個附加目的，希望能發展以地景考古學的理論與方法來研究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古代政治經濟發展過程。

很幸運的，KEP 長期與其它單位的合作關係使我這兩年前往 Kalinga 做田野的過程中沒有受到任何來自官方或民間的刁難。回想當年在土耳其的田野，為了相關單位尚未批准研究許可，我連續三個星期只能待在當地的旅館裡看書，或到海邊散步，永無止境的等待，再怎麼著急也沒用，因此我完全能理解並對本專題研究其它幾位作者遭遇到的困難深表同情。唯一不舒適的經驗是進入山區的交通情形。

菲律賓從城市到鄉間常見一種拼裝車 Jeepnie，雖然多以老舊零件組成，外表卻是色彩斑斕。從 Kalinga 的省會 Tabuk 進入山區，Jeepnie 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通常從 Tabuk 到每個定點一天一班，下車後再各自步行回居住村落，走上兩三個小時的大有人在。Jeepnie 的車頭像吉普車，車身後段拉長，兩側橫排座椅，合理的估計乘客總人數應該上限 16 人。然而在我的經驗裡，上山車班沒有一次不超載，少說有四十人，男人多半擠在車頂上。不僅如此，車裡還塞滿了各式各樣的行李，五十公斤裝的飼料袋、水泥、鋼筋、桶裝瓦斯、一

箱箱罐頭還是醬油沙拉油什麼的、市場批購的菜蔬雞鴨魚肉、活雞則綁著塞到座椅下，運氣夠好還會遇上腳下踩著的母雞生蛋。我曾見過兩次別車爆胎，乘客們揹著行李下車魚貫而出，好像魔術師的帽子裡怎樣也拉不完的彩繩。山路崎嶇狹窄，鬆軟的路面晴天塵土飛揚，下雨則泥濘不堪，常有土石流發生，一路滑落下百米深的山谷。每次坐車提心吊膽，單程需要四、五個小時，擠在裡面動彈不得，下車感覺老了十歲。

田野期間

一進入Kalinga我迫切開始田野工作，很快我得到一個結論，此地不適合繼續以南海貿易的區域互動做為主題，原先擬定的研究計畫不可行。在我的田野經驗裡，這類問題發生已經不只一次，我想這無關於研究計畫準備是否充份，而是過於堅持理論取向的假設-演繹法所難以彌補的弱點。儘管有些失望，還好後來得以依照實地情況調整研究計畫的方向。再見了，南海貿易。接下來，我把焦點轉到Kalinga人的空間區隔模式，與隨著新物質（例如水泥）傳入而改變的空間使用習慣。⁴

材料特性不如預期之外，我的田野工作也受到部落戰爭的影響。2004年12月當我第三次前往Kalinga的時候，正好遇到賄選衍生的暗殺事件，附近幾個部落包括屬於Pasil Municipality 的Guina-ang和Balenciagao與Lubuagan⁵之間的**bodong**（和平協定）破裂，當地人的心思被部落戰爭牽引著。這個事件對我的工作影響很大，尤其在部落交界處進行調查有被狙擊的危險。按說我身為一個外地人，不該是部落戰爭的仇殺對象，但誰能保證幾百公尺外的狙擊手有好眼力？為此，當地友人要求我不要單獨外出，隨行的當地嚮導們都攜帶武器。也許是Kalinga人樂觀的天性，往往我在一個地方做完記錄還要等上個把鐘頭等他們打獵回來。此地非法私有槍械情形普遍，從土製手槍到軍方流出的M-16步槍琳琅滿目，博物館級的二十世紀初期單發步槍也有不少。在討論Kalinga

⁴ 這裡簡單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以前Kalinga人住木造杆欄式建築，樓板下養豬／雞或是堆放木材雜物，水泥傳入以後，杆欄式高架住屋比例減少，越來越多人家生活面降至地面，飼養家畜與儲物的空間則往庭院擴散。

⁵ Lubuagan 是另一個緊臨 Pasil 的 Municipality，以好鬥著名。在 Lubuagan，境內的**bino-boroy**（派系衝突）比整個 Lubuanga 部落對其它地區的部落戰爭更為嚴重，他們害怕鄰居更甚於周遭部落。血腥仇殺在當地多不和解，受害方一定要復仇，理由是父兄無價，必須血債血償。

社會經濟組織時，私有槍械是值得注意的。制式槍支的價格往往高於建造一棟房子所需的花費，像Kalinga這樣缺乏現金收入的地方，不少家庭私有的槍支其價值居然佔家庭資產總額大半。我問過幾戶人家為什麼不把槍賣掉換幾塊水田，這樣就不用操心米不夠吃，得到的回答總是與部落戰爭有關，他們要保衛家園。除了部落戰爭，我也遇到幾次菲國軍方追剿左派游擊隊NPA（New People's Army）的隊伍。有一天前往Bagtayan的路上，遇到約一排兵力剛從該村落離開的菲國陸軍，一位中尉指揮官和我聊天，他直言很擔心我會被綁架，建議我要多加小心。這類安全問題的考量雖然重要，但實際上我能做的不多，後來也只好當做沒這回事了，繼續我的田野調查。

物質遺留之所以有一定形式，那是人類行為模式作用的結果，這是考古學的基本假設之一。部落戰爭的經歷提醒了我從「空間區隔」的角度來討論Kalinga人的物質文化所反映出的心理／社會層面。以牆或圍籬來說，做為一個區隔空間的裝置，其材質和形式有什麼意義？部落戰爭期間，我看到很多人在通道或院子加築石牆。我懷疑這道石牆能有什麼實際的防衛作用，約莫一米的高度，敵人再不濟也可以輕易跨越。我想，一個史前考古學家如果在舉落遺址裡發現這樣一道道的矮牆，是不會將它解釋做具有防禦功能的。對考古家來說，合理解釋應該是豬圈結構遺跡。然而，受訪者揮汗鑿石之際，態度嚴肅地這樣回答我「夜色之前我們得趕工，Lubuagan人隨時都會打過來。」看來他們真的相信這道牆可以防禦敵人入侵。⁶

對於考古遺址裡空間使用的辨認上，Kalinga 人的屠宰文化可做為一個類比的經驗。米是 Kalinga 人的主食，副食以栽培或採集的蔬果為主。但是在一些重要的場合如婚喪喜慶，主人一定要屠宰豬或水牛，較為平常的或經濟力不佳者可以殺雞或狗代替。祭祀活動裡屠宰犧牲更是不可或缺，儘管 Kalinga 人多半信仰天主教，傳統信仰在日常生活裡仍然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田野期間我為了記錄 Kalinga 人儀式行為的空間使用情形，特別造訪了幾次葬禮與部落和平協議締約慶祝必須屠宰水牛的大場面。從宰殺、肢解處理、烹煮到賓客食用後的拋棄模式都是觀察重點。我混在人群裡不停地拍照。據說以前殺水牛必須由健壯的男人執行，現在簡單多了，槍決後牛身倒下，幾個人聯手肢解。從長刀切開喉嚨放血開始，好像爆水管一樣大臉盆一下子裝了半滿，接下來開膛剖

⁶ Kalinga聚落內外有各式牆和圍籬，特徵是心理功能大於實際功能，將另文討論。

肚內臟流滿一地，當斧頭劈開牛骨時碎屑四濺，畫面相當煽情，從擠滿圍觀的小孩子臉上可以看到好奇心被滿足的表情。過幾天我回到原地，兩三百人宰殺了水牛的聚會場地竟然只找到掛在樹上的一對牛角，骨頭都被狗吃掉了。

很偶然的，**Kalinga** 屠宰文化也拉近了我和一些當地人的距離。民族考古學田野工作順利與否，很大的一個關鍵是當地人群對研究者的接納程度。一個人闖進陌生的社區裡，整天問一些瑣碎的問題，我常想怎麼樣才可以和受訪者建立良好關係。某天，寄宿家庭一個男孩晚餐後舉止怪異，宣稱有「東西」纏著他，哭喊狂奔玩鬧。女主人請來鄰居和薩滿驅邪，一致認為是隔壁村 **Malucsad** 的女鬼附身。眾人抓住男孩，將薑塊搗碎與橘葉搓揉後塗抹他的身體，並點燃火柴燒男孩的一小撮頭髮。薩滿做法同時，女人們圍在旁邊誦讀玫瑰經。男孩情緒起伏甚劇，哭鬧不止，他的叔父連忙從豬圈拉出一隻土豬準備宰殺犧牲給女鬼。當時我剛好經過門口，人手不足，他們示意要我幫忙。眾人已經就位，只剩一個工作，我割斷了那隻豬的喉嚨。過去我最殘忍的殺生經驗是在溪裡釣魚。從那個驅鬼的晚上開始，我從一個外人變成了他們的兄弟。整個事件讓我想到，作為一個研究者，為了接近當地人群蒐集資料，行為道德或價值觀的底線在哪裡，那天殺的是一隻豬，下次會發生什麼事，參加部落戰爭嗎？這件事可得好好想一想。

我在田野地的寄宿村莊有一台柴油發電機，每天晚上供應約三個小時電力全村使用，可以勉強點亮暗淡的燈泡。有些人喜歡聽收音機，但收訊不佳，斯斯撒撒的噪音相當可怖，我總是躲的遠遠的，山下發生什麼事一概不知。某天晚上有人小心翼翼地問我，「你家離海邊很近嗎？」我回答不近。他似乎鬆了一口氣，「海浪很大，捲走了十幾萬人。希望你的家人平安。」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過了幾天我才弄明白發生了海嘯襲擊的不幸事件。如果這樣就斷定說我的田野地 **Pasil Municipality** 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那就錯了。這裡可是地球村的一部份呢，證據是衣服上的圖案。有中國足球國家隊的 10 號球衣，台灣某個高中的軍訓服（還繡著名字），也有人穿印著美國大學聯盟 **Wisconsin Badgers** 和 **Utah State Aggies** 的外套，我的寄宿主人喜歡穿一件辛那提紅人隊的套頭衫，有一些也許是歐洲足球隊的衣服我認不得。有一天我看到一件 2004 年美國職棒世界大賽冠軍聖路易紅雀隊紀念 T 恤。等一下，聖路易不是連輸四場被波士頓紅襪隊掃回家了嗎？頓時我覺得不是很愉快。我感到這個地球村的一份子似乎是扮演垃圾場的角色。我問他們知不知道衣服上這些圖案代表

什麼？沒人知道，他們也不在乎。我想起附近山區公路上常見到鏽蝕老舊不堪的推土機，當地人告訴我這些是地方政府前兩三年才買來的，一下子就不會動了，也修不好。從推土機上的日文漢字推想這些應該是日本公司報廢的機器，就像紅雀隊「冠軍紀念」衣服在開賽前就做好了，後來不幸輸球才廉價賣到這裡。一百年後考古家發掘挖到這件衣服，會不會拿來做為挑戰歷史文獻記錄的證據呢？

準備下一次的田野

如果將撰寫研究計畫比擬成播下一顆種子，田野期間所見所聞就是滋養孕育這顆種子發芽生長的養份，依照各地區的資料特性，很難保證這顆種子會長成什麼樣，甚至「種豆得瓜」也很可能發生。近兩年在 Kalinga 的民族考古田野，我的研究計畫就好像一個見風就長的怪物，一次又一次變。我預計畢業之前還要再去田野一到兩次，最終我的論文將以何種面貌呈現，這個問題，恐怕要等到最後的田野回來才能確定。